

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呂妙芬

摘要

江西吉安府是陽明講會活動最興盛、也是影響陽明學發展甚鉅的區域。本文主要研究後王陽明時代（1528 年以後），陽明講學在吉安府的發展與變化，詳細介紹安福、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各縣的陽明講會歷史，發現從嘉靖到晚明年間，吉安陽明講學主要有兩個興盛期：(1) 1530s-1540s 年間，由鄒守益、羅洪先、聶豹、歐陽德帶出的講學，是陽明講會活動的鼎盛時期；(2) 1570s 經歷另一波復興，此期主要講學領袖是鄒德涵、王時槐、劉元卿、胡直、郭汝霖等人。本文除了詳細敘述上述學者與各縣講會發展的關係，也試圖呈現影響江右陽明講學開展的歷史因緣，如學者個人的政治與生命遭遇、科舉與講學關係、陽明後學對學派認同意識的變化等，文末並對地方史料記載的限制略作討論。

關鍵詞：陽明學、江右、鄒守益、羅洪先、聶豹、歐陽德、王時槐、劉元卿、胡直

The Yang-ming *Chiang-hui* Activities in Chi-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Miaw-fen Lu

Abstract

Chi-an Prefecture had been the most prominent area for the Yang-ming *chiang-hui* (learning and discussing meetings) since the 1510s.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he Yang-ming *chiang-hui* in Chi-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post-Wang Yang-ming era (from 1528AD), especially in the five representative districts of An-fu, Lu-ling, Chi-shui, Yung-feng, and T'ai-ho. During this period, the Yang-ming *chiang-hui* in Chi-an experienced two waves of prosperity: one was in the 1530s and 1540s, the leading scholars were Tsou Shou-i, Lo Hung-hsien, Nieh Pao, and Ou-yang Te; the other in the 1570s and advocated by Tsou Te-han, Wang Shih-huai, Liu Yüan-ch'ing, Hu Chih, and Kuo Ju-lin.

In addition to dealing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ming *chiang-hui* in each district, this article also touches upon some influenti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ang-hui* history and scholars' life experience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In an area with highly cultural competency like Chi-an,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required more visible achievements to be recorded in local histo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of written texts have also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there are indications showing every possible existence of some or many local *chiang-hui* without written records and thus strongly reminding us of the limit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which we have to rely in dealing with the matter.

Key words: Yang-ming learning, Chiang-you, Tsou Shou-i, Lo Hung-hsien, Nieh Pao, Ou-yang Te, Wang Shih-huai, Liu Yüan-ch'ing, Hu Chih

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呂妙芬**

- 一、前言
- 二、安福與廬陵
- 三、吉水
- 四、永豐
- 五、泰和
- 六、結語

一、前言

陽明學在明代最興盛的時期，據稱「流風所被，傾動朝野」，¹這個在明朝一代深具影響力的學派，其建構、發展與江右地區有極密切的關係。正德十二年(1517)王陽明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南、汀、漳等處，往後四年內，在一連串平定寇亂、建設南贛的政治經營中，王陽明不忘講學，隨著其軍事政績的成功，王陽明也逐漸成為舉國聞名、集事功與學術成就於一身的大儒者，許多江右學者開始認真接受他的學術，不少人更終身以傳遞他的學術為使命，終於成功地將陽明學建構為一個可與程朱學抗衡的新學

* 本文是國科會補助計劃「明代江西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NCS89-2411-H-001-080)的研究成果之一，研究過程中受到助理黃吏坊小姐的協助，成文後又蒙二位論文審查人提出許多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¹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231，頁6053。

派。²王陽明去世(1528)之後，門人分散各地，展開講學授徒的工作，陽明學遂進入快速倍增的時期，不僅地域分佈擴散、人數增多，思想內涵也起了分化。

當陽明學派在嘉靖(r. 1522-1566)年間快速發展的階段，江右又是個關鍵地，透過江右學者的講學活動，才真正將陽明學推到鼎盛。而江右地區的講學，又以吉安府最興盛。重要講學領袖鄒守益(1492-1562)、羅洪先(1504-1564)、歐陽德(1496-1554)、聶豹(1487-1563)等均出身吉安，王畿(1498-1583)說：「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蓋因東廓諸君子以身為教，人之信從者眾。」³這幾位學者除了在本鄉帶領講會，也共同倡導青原會，《廬陵縣志》記道：「明正德間，姚江王守仁令廬陵，安福鄒守益從遊青原山，講良知之學。其後會講者吉水羅洪先、永豐聶豹、泰和歐陽德，於是青原講學稱鄒羅聶歐。」⁴

江右既然是陽明講學的鼎盛區，學者雲集，師友關係錯綜，各學者思想內涵所涉及的論辯分析更是複雜，過去學者對此地區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其中除了對個別學者思想內涵進行分析、比較之外，⁵對於江右的社會、士紳家庭、書院、講學、教育方面，也有一些作品，如 Kandice Hauf 的博士論文 “The Jiangyou Group: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以聶豹、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四位學者與其家庭為主要研究對象，觀察十六世紀江右社會的運作，以及士紳階層在地方社會、家庭生活等情形。⁶李才棟的《江西古代書院研究》，討論從唐五代一直到清代江西省

² 呂妙芬，〈陽明學派的建構與發展〉，《清華學報》，29.2（1999年），頁167-203。

³ 王畿，〈漫語贈韓天敘分教安成〉，《王龍谿先生全集》（道光壬午1822年會稽莫晉重刊本），卷16，頁27b-28b。

⁴ 《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18，頁45b。

⁵ 從《明儒學案》始，有關明代思想史的書籍通常有相當的篇幅討論江右著名學者的思想。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一書，對聶豹與王畿之辯論，以及江右從聶豹、羅洪先、劉文敏、劉邦采、王時槐、下至劉宗周的討論，又是極具代表性的研究。

⁶ Kandice Hauf, “The Jiangyou Group: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87).

的書院，其中對於明代陽明講學活動、講會式書院，有豐富的史料與精闢分析。⁷吳宣德的《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以江右著名陽明學者為考察對象，討論範圍涵蓋了學者個人的思想、江右陽明學與書院、講學、教育的關係。⁸John Dardess 的 *A Ming Society*，則選擇以泰和縣為研究焦點，探討泰和縣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社會、文化、學術政治實力、與學者心理等所經歷的變化，對於陽明學在泰和縣的發展亦有觸及。⁹

本文主要想探討後王陽明時代（1528 以後），陽明講會活動在吉安府的持續發展與變化。雖然部分史料與研究對象與上述作品有重疊，但所關注的議題與所展開的議論並不相同。本文主要希望分別從嘉靖到晚明之間學術傳承與演變，以及從縣內地區分佈的角度，更細緻探討陽明講會活動在各縣的發展歷史，希望藉著並列式地描述各縣的講學歷史，能夠更清晰呈現影響江右陽明講學開展的某些特殊歷史因緣，例如科舉與講學的關係、學者個人的生命遭遇對江右一地講學的重大影響、第三代門人是否能夠佔領學術文化領導位置、陽明後學逐漸鬆脫的學派意識、以及史料本身可能的限制等。至於江右學者的思想內容，晚明江右面對江南文化的衝激時，講會所呈現的特殊風格，以及江右學者的地域認同等議題，筆者擬另撰文討論，無法於本文處理。

吉安府地處鄱陽湖流域，鄱陽湖流域的開發到北宋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日益興盛，明清時期更趨活躍，市鎮迅速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亦更繁榮。據統計，吉安廬陵等縣在宋已有六個市鎮，廬陵縣的商稅、鹽稅收入亦頗可觀。¹⁰又鄱陽湖流域扼中原通往閩、浙沿海和嶺南地區的要道，交通地位自古以來即十分重要。吉安則位於贛江水道、通往廣東的主要交通網絡上，也在京廣驛路的幹線上。¹¹興盛的經濟活動和重要的交通樞紐地位，不

⁷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⁸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⁹ Joh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¹⁰ 魏嵩山、蕭華忠，《鄱陽湖流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章。

¹¹ 魏嵩山、蕭華忠，《鄱陽湖流域開發探源》，第9章。

僅造就江西的經濟實力，亦提昇此地的文化成就。

江西從宋以降真可謂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據統計有宋一代江西進士高達 5,442 人之多，居全國之冠，此顯示江西在政治領域中的雄厚實力；在文學、文藝領域，江西同樣人才輩出，著名的古文大家歐陽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曾鞏(1019-1083)均出身江西，宋代詩壇上的「江西詩派」亦赫赫有名；理學家朱熹(1130-1200)和陸九淵(1139-1192)的學術在此地也都有深厚影響，加上經濟發達的條件，使得江西從南宋始書院講學教育的機制極為興盛，至明代又逢陽明學的興發，書院講學之建置益發興盛。¹²吉安府的文化成就更是江西省內的佼佼者，明代《吉安府志》稱吉安「至歐陽修一代大儒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繼起者，必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家誦詩書，人懷慷慨，文章節義遂甲天下。」¹³從吳宣德所統計明代江西省內各縣進士總人數，亦可見吉安府卓越的文化實力。¹⁴

明吉安府地處江西西方，分別與江西的袁州、臨江、撫州、贛州、南安各府，以及湖廣長沙、衡州、郴州府交接（見附圖一）；據明《吉安府志》記萬曆十年(1582)時，全府田地山塘總面積約五萬五千零三十頃九十七畝，登記戶丁數為二十七萬九千八百零七戶、四十萬二千八百三十三丁。¹⁵吉安府共轄九個縣：安福、廬陵、吉水、永豐、泰和、萬安、龍泉、永寧、永新，其中以廬陵縣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吉水、泰和、永豐、安福次之，¹⁶這些縣亦是全府知識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區，相較之下，永寧縣和龍泉縣學術水平

¹² 參見《江西風物志》（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

¹³ 《吉安府志》（明萬曆13年刊本）於《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30（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卷11，頁2b。

¹⁴ 據吳宣德的統計，江西71個縣中只有7個縣總進士人數在100人以上，其中便有4個縣屬吉安府。吉安府內的見氏著〈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一文，此文在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學術網路中發表傳閱。

¹⁵ 《吉安府志》（明萬曆13年刊本），卷13，頁1a。

¹⁶ 關於各縣戶丁數與田地山塘面積，參看《吉安府志》（萬曆13年刊本），卷13。

低弱，¹⁷永新和萬安縣雖然有些學者從事講學活動，¹⁸但整體而言，講會較不熱絡，也沒有出現舉國聞名的講學領袖。因此下文將主要探討鄒守益、劉文敏(1490-1572)、羅洪先、聶豹、歐陽德等學者所領導形成的講學中心，亦即安福、吉水、永豐、泰和四縣內的講會活動，廬陵縣的講學因與安福南鄉學者關係密切，將於討論安福縣時一併介紹。

二、安福與廬陵

安福縣的陽明講學從早期鄒守益和劉文敏、劉邦采（1528 舉人）等人的領導開始，在嘉靖(1522-1566)前期已有相當成績，青原會的盛況和復古書院的創建，使江右成爲當時全國講學最興盛的地區。當老一輩的學者凋謝之後，繼起的學者如王時槐(1522-1605)、鄒德涵(1538-1581)、鄒德溥（1583 進士）、劉元卿(1544-1609)等人，不但承擔了學術傳承的工作，也開創新的講會聚點，使講會活動在張居正禁學(1579)和東林之禍(1625)的兩波毀書院行動中，繼續存活。

以地理的分佈而言，鄒守益是北鄉徹源人，因此鄒氏家族與安福的北方、東方有較密切的關係；劉文敏、劉邦采則出身安福南方望族，除了領導安福南鄉講學、創建復真等書院，其門人衆多，其中以王時槐和劉元卿最有功於講會活動，王時槐主要講學地在廬陵縣的西原，劉元卿則努力在安福西里提倡講學、開創講所。下文將分別以北方的鄒守益家族和南方劉文敏家族

¹⁷ 從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進士人數的明顯差距可見三縣學術水平較弱，附表一；亦參見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

¹⁸ 永新縣內有甘公亮、劉孔愚、顏鐸、賀世采、戴有孚、甘雨等人參與陽明講學，見《永新縣志》（同治 13 年刊本），卷 16，頁 31b-40b。萬安縣有朱衡、周賢宜等人聚講精修觀內，後於嘉靖二十七年興建雲興書院，見《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書》（四）（台北：正中書局，1979 年），頁 174。其他兩縣的陽明講學者，可參見縣志的記載，但主要跟隨在本文所討論的講學領袖下，從事講學活動。另外，永新縣是顏鈞的家鄉，顏鈞二十五歲時接觸陽明學而有得，在家鄉成立「三都萃和會」，宣講儒學倫理要義。又曾師安福劉邦采，但無所得，後拜王艮爲師，成爲泰州學派著名的講學者，然顏鈞中年講學地多在大江南北各地，並不在永新，晚年雖居鄉多年，但卻沒有太多講學的記錄。關於顏鈞生平，見《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及其傳人爲主，配合時代的推移，介紹陽明講會在安福縣的發展，並旁及廬陵縣的講會。

鄒守益是王陽明的高弟，也是江右地區最重要的陽明學領袖，劉宗周(1578-1645)和黃宗羲(1610-1695)均以其爲最能得師門真傳的陽明後學。¹⁹鄒守益出身安福世家，鄒家從十五世紀初年已習舉業，鄒守益的父親是弘治九年(1496)的進士。²⁰具此良好家世的鄒守益，在科場上果然有極佳的成績，他十七歲即中舉人，二十一歲(1511)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真可謂前途無量，然而實際上他官運並不順遂。嘉靖二十年(1541)，鄒守益以五十一歲之齡落職歸里，但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仕宦生涯中，其實真正出仕的時間還不到十二年，所謂「三十年中三仕三已而已，祿食之日不滿一紀。」²¹再加上他落職歸里後約有二十年的講學生涯，鄒守益可謂把人生大半的精力都致力於講學的志業上。²²

鄒守益考取進士後，授翰林編修，第二年告假歸養，在虔臺與王陽明等人究道論學，後跟從王陽明擒宸濠有功，世宗登位後以舊臣錄用，卻因大禮議的疏爭被貶廣德州判，他在廣德成立復初會、建復初書院，後又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等職，帶動了南中地區陽明講學的風氣。²³嘉靖十二年(1533)，鄒守益回到安福，當時的安福縣令正是同爲陽明弟子的程文德(1497-1559)，他們在南鄉惜陰會的基礎上，²⁴共同開創了江右陽明講學的高峰。

¹⁹ 劉宗周：「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慎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賴以不蔽，可謂有功師門矣。」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師說〉，頁8。

²⁰ 關於鄒守益家族，見Kandice Hauf, "The Jiangyou Group: Culture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pp. 131-142.

²¹ 一紀指十二年。引文見鄒德涵，〈文莊府君傳〉，《鄒聚所先生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3，頁55a-b。

²² 鄒守益生平，亦見耿定向，〈東廓鄒先生傳〉，《耿天臺先生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14，頁10a-29a。《明史》，卷283，頁7269-7270。

²³ 鄒守益與歐陽德等人對南中一帶講學有極大啓發作用，見呂妙芬，〈晚明寧國府的陽明講學活動〉，《新史學》，12.1（2001年），頁53-114。

²⁴ 南鄉惜陰會成立於1526年，見下文。

嘉靖十二年(1533)七月，鄒守益召集第一次青原山聚會，〈書青原嘉會卷〉中記道：「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從事于君子之學。東廓子守益喟然嘆曰：『茲會也，先師嘗命之矣，乃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也。』」²⁵可見聚講青原的構想原出於王陽明。青原山位於廬陵縣城東南十五里，是著名佛教道場所在地，鄒守益等學者倡會於此，使它成為陽明講學的名會場。²⁶青原會屬於吉安府各縣學者共同參與的大型講會，通常於春秋二季舉行，鄒守益：「惜陰之會舉于各鄉，而春秋勝日復合九邑及贛撫之士，會于青原，交砥互礪。」²⁷這裡九邑指吉安府中的九個縣，不過實際上，青原會還吸引了吉安府以外的江西學者、甚至外地陽明學者的參與和觀摩，例如黃弘綱(1492-1561)、王畿、錢德洪(1496-1574)和門人都參與過青原會。²⁸青原講會的規模可達二百人之多，²⁹其盛況也激勵、帶動了其他地區的講會，最有名的如寧國府涇縣的水西會。³⁰

除了青原會這類大型講會，安福縣尚有各鄉惜陰會，³¹各鄉惜陰會和青原會的成功，使得程文德與鄒守益於嘉靖十五年(1536)順利在安福縣儒學的舊址上興建了復古書院。復古書院屬於全縣共同的文化資產，有別於其他各鄉所興建的書院，³²也是陽明學在江右的象徵性地標，王畿說：「……東廓諸君子以身為教，人之信從者眾，創復古書院以待來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

²⁵ 鄒守益，〈書青原嘉會卷〉，《東廓鄒先生文集》（據明嘉靖末年刊本攝，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資料），卷9，頁14b-16b。

²⁶ 參見釋笑峰等撰、施閏章補輯，《青原志略》（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6年）。

²⁷ 鄒守益，〈簡方時勉〉，《東廓鄒先生文集》，卷7，頁14a。

²⁸ 王畿和錢德洪曾帶領貢安國等諸生赴青原會，並商議涇縣成立水西會之事，見《寧國府志》（康熙12年刊本），卷5，頁22a-b。

²⁹ 鄒守益，〈青原再會語〉，《東廓鄒先生文集》，卷9，頁19a。

³⁰ 《寧國府志》（康熙12年刊本），卷5，頁22a-b。

³¹ 第一個惜陰會成立於南鄉，北鄉有東山會與連山書院，東鄉有道東書院，西則有識仁書院等，見下文。

³² 「按書院惟復古公於一邑，若東之道東，南之復真、同善，西之識仁、復禮、中道，北之宗孔，則又各鄉所建者。」見《安福縣志》（乾隆47年修本），卷5，頁10。

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參次其間，上下論辯，有交修之益。」³³

根據鄒守益，復古書院的興建除了地方士民「蓄木者獻其材，藏書者獻其籍，積產者獻其田」的共同奉獻外，還得力於季本(1485-1563)、屠大山(1500-1579)、徐階(1503-1583)等官員的資助。³⁴書院的建築結構為：前為道德門，中為文明堂，左右有忠信、篤敬兩齋，後為茂對堂。東西兩側共有號舍八間，尊經閣下祀王陽明。書院置有院田，每年田租共一千一百九十三桶糧。³⁵

鄒守益所創的講會，除了青原、復古的講會外，尚有東山會，此會與鄒氏家族關係密切，至少持續六十年以上。王時槐記：

昔鄒文莊公親受學於越中王先生之門，歸而以所聞示邑之仕紳耆舊，諸文學後進咸翕然興起者，發蔀啓扃而人覩日月之重輝也。於是聯諸同志會集於東山塔院，已而門人於塔院之後特建講堂，月舉二會，輪直具膳以為常。公歿，令子若孫太常憲僉迄今太史侍御，世遵行之，弗替也。蓋肇自嘉靖壬寅(1542)既歷六十有餘年矣。³⁶

可見鄒守益起初是利用東山塔院講學，成立東山會，後來才在塔院後方蓋了講堂，此會每月舉行二次，是地方性的小會。從 1542 年以降，到 1604 年王時槐寫〈東山會田記〉時的六十二年間，東山會一直由鄒氏子孫主盟，並聚會不斷，這樣由一個家族維繫達六十年的講會在講會史上是極難得的例子。1600 年左右，鄒守益的曾孫，即鄒德涵的兒子鄒袞³⁷因感於「嘉會頻舉而供未備，非可垂遠」，又因東山會是先人志業之所在，特別割田，捐出每年四百桶的田租給東山會，以供會事之用，而且每年推舉同志二人負責出納，並

³³ 王畿，〈漫語贈韓天敘分教安成〉，《王龍谿先生全集》，卷 16，頁 27b。

³⁴ 鄒守益，〈復古書院記〉，《東廓鄒先生文集》，卷 6，頁 17a-19a。

³⁵ 《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3，頁 6b。

³⁶ 王時槐，〈東山會田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 年），卷 3，頁 38a-39b。

³⁷ 當時為諸生，大約生於 1561 年，因其自述「弱冠失怙」，而其父鄒德涵卒於 1581 年。見鄒袞，〈鄒氏學脈序〉，《鄒氏學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延邀四鄉士友聚集講學。³⁸由《安福縣志》也可見潘濬為知縣時（約1589-1595）曾聚講東山。³⁹

青原會和復古書院講會在鄒守益身後略為衰退，雖然鄒守益的兒子鄒善（1521-1600）繼承家學、也熱衷講學，他曾在京師時與耿定向（1524-1596）、羅汝芳（1515-1588）、胡直（1517-1585）等學者聚講，任山東學政時，倡學於志道書院；罷官回鄉後，與王時槐等人講學，又帶領北里耆儒俊士講學於任仁堂，建宗孔書舍，對復古書院和東山會也多有貢獻。然而，青原山講學的風氣在1569年到1570s初期復興，主要卻應歸功鄒善之子鄒德涵，因為此時鄒善仍仕山東。⁴⁰

鄒德涵出身理學世家，年幼時即以遠大抱負深得錢德洪的賞識，二十一歲舉鄉試後，隨父親赴刑曹，當時鄒善與耿定向等三五知己結社論心，鄒德涵遂拜耿定向為師。耿定向任南直隸督學御史，招鄒德涵於南畿，鄒德涵在耿定向與羅汝芳的啟發下，發憤向學。劉元卿記：「君（德涵）時於學未有悟入，因近溪公法語斥君，用是晝夜鑽研，大肆力於學，聞天臺先生以識仁為宗，遂閉門靜坐一月，猶不得，則與諸友究析辯難。一夕夢文莊公試以萬物一體論，醒而若有悟，自是稍稍契會天臺先生之旨。則先生既已領之，嘗以書寓友人云：『吾昔未知學，賴近溪公逼之，天臺師薰之，焦從吾氏點之，故幸有聞。』」⁴¹可見鄒德涵之學得力於耿定向、羅汝芳的指點甚深。

稍後，鄒德涵又前往父親在山東的官署，鄒善見其學念正濃，大喜，督率益勤。此時鄒德涵、鄒德溥二兄弟朝夕共學，明辯析疑，彼此期勉，他們

³⁸ 同註36，亦見劉元卿，〈題東山會志〉，《劉聘君全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12，頁30b-31b。

³⁹ 創建道東書院的謝時泰亦參與東山講學，見《安福縣志》（康熙18年刊本），卷3，頁76b-77a。潘濬任安福縣令共七年，始於萬曆十七年，見《安福縣志》（乾隆47年修本），卷7，頁11b；鄒德溥，〈賀邑宰潘澄源公擢大司馬郎序〉，《鄒泗山先生文集》（清安成紹恩堂刊本，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卷3，頁5a。

⁴⁰ 鄒善生平，見鄒德溥，〈先考中奉大夫大常卿穎泉府君行狀〉，《鄒泗山先生文集》，卷7，頁28a-40b。

⁴¹ 劉元卿，〈鄒聚所先生言行錄〉，《鄒聚所先生外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頁79a-b。

對於鄒善在山東督學的工作亦有幫助。鄒德涵、鄒德溥二人於隆慶三年(1569)由山東返回安福，便立即展開講學的活動：「汲汲萃諸友商學，若求亡子，而動稱堯舜可爲。」⁴²鄒德溥記載當時鄒德涵馬不停蹄地講學，並以「聖人爲必可學」激勵後進，許多人目之爲狂生，但他的熱誠也確實開始影響一批年輕學者，鄒德溥說：「然士人亦稍稍來附，有醒悟者如調甫（即劉元卿）輩三五人，耽心學道，實自伯兄始。」⁴³而劉元卿敘述自己對鄒氏二兄弟倡學的反應及影響則說：「予始聞而駭，中而信，君喜予之信也，則挽之益力，予亦竭力輔君倡督，則劉子克所，彭子毅所，暨予師伍盡吾諸君，皆津津向入。」⁴⁴可見鄒德涵成功地結集了新一代的江右學者，再創青原會的盛況。根據劉元卿的記載，自從鄒德涵兄弟居青原山講學後，過去士人攜妓入山的風氣銳減，一時士風丕變。⁴⁵而除了在講學風氣的帶動和學問內容的啓發之外，鄒德涵也捐錢買田，供青原會會事之用。⁴⁶

鄒德涵於隆慶五年(1571)成進士，上疏極言王陽明功德宜祀，又講學甚力，因爲張居正對講學者的反感，加以與鄒德涵同邑又同年的傅應禎（1571進士，d. 1587）、劉臺（1571進士）先後詆張居正，鄒被歸爲傅、劉同黨，遂被外調河南按司僉事。後張居正同黨再疏論降調之，鄒德涵便辭官回里，居樓讀書，可惜不久即因疾卒，享年只有四十四歲。⁴⁷

鄒德涵倡學安福的時間主要在 1569-71 年間，以及致仕後很短的時間，他也參與復古書院的講學，不過當時真正致力於復古、復真書院教務的，應該是劉邦采的學生朱調⁴⁸等人，鄒德涵寫給朱調的信曾曰：「復古復真會全

⁴² 劉元卿，〈鄒聚所先生言行錄〉，《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80b。

⁴³ 鄒德溥，〈伯兄汝海行狀〉，《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94a-b。

⁴⁴ 伍盡吾即伍惟忠(1537-1577)，字效之。其傳見劉元卿，〈進士盡吾伍先生行狀〉，《劉聘君全集》，卷 8，頁 21a-24a。

⁴⁵ 劉元卿，〈鄒聚所先生言行錄〉，《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80b。

⁴⁶ 鄒德溥，〈伯兄汝海行狀〉，《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98b。

⁴⁷ 《明儒學案》，卷 16，頁 335。《明儒學案》記年五十六歲，實誤。又見劉元卿，〈鄒聚所先生言行錄〉，《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78b；鄒德溥，〈伯兄汝海行狀〉，《鄒聚所先生外集》，頁 77a-90b, 90a-99b。

⁴⁸ 朱調，字以相。棄學業，學於鄒守益和劉邦采，得其微旨，遂涉吳楚，走新安諸郡，求

仗巨力撐持」。⁴⁹由於鄒德涵的早卒，使他對江右講學的開創無法繼續，這是令講學者最惋惜的。然而就在鄒德涵興發帶動青原講會的同時，南鄉學者王時槐和廬陵的陳嘉謨（1547 進士）都於 1570s 初期致仕歸鄉講學，劉元卿也於 1571 年開始授徒，並於頂泉寺講學，他們將成為新一代的講學領袖，也將帶出另一個講學的高潮。⁵⁰因此約當 1604 年，鄒袞欲再振東山會並編纂《鄒氏學脈》以發揚家學時，他仰慕的學者，固然是自己故去的曾祖、祖父和父親，但同時也是當時安福的學術領袖王時槐和劉元卿。

張居正禁講學、毀書院的政策對江右講學造成相當大的衝激，復古書院遭受極大損毀，書院失掉一大部份的院田，⁵¹學禁之際，書院僅能以祠祭名義存在，因此萬曆九年(1580)書院改名為三賢祠，祀王陽明、鄒守益、程文德。萬曆十二年(1583)建二賢祠於茂對堂，祀劉文敏和劉肇袞，陪祀黃旦。⁵²張居正去世後，鄒元標(1551-1624)上疏請復書院之毀於江陵者獲准，復古書院舊額遂得復，不過此時書院舊田尚未全數收回，書院亦荒毀大半，據王時槐所記，楊廷筠(1562-1627)⁵³任知縣時，曾清復院田，後經由鄒德泳等鄉紳的努力，得到知縣潘濬和按臺吳應明等官員的幫助，捐俸數十金，⁵⁴增置院田，又以新墾餘糧抵額賦以優惠書院，並於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二年

友質訂。歸侍劉陽於三峰，郡邑歲舉道會，祁寒暑雨必赴，著有《梅山語錄》。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刊本），卷 3，頁 15a-b。

49 鄒德涵，〈復朱易菴先生〉，《鄒聚所先生文集》，卷 4，頁 31b。

50 見下文。

51 傅應禎的記曰：「倪侯不得已，委曲遷就覈復古原田若干畝，損其什三，變價以應又不足，則捐俸助之，告佃於當道，易名三賢祠。」傅應禎，〈重修復古書院記〉，《安福縣志》（同治 11 年刻本），卷 17，頁 33a。劉元卿記曰：「覈復古所置田之半，鬻之得數十金，告佃於當道，易名三賢祠。」劉元卿，〈復古書院續置田租〉，《劉聘君全集》，卷 7，頁 18a。

52 劉肇袞、黃旦的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刊本），卷 3，頁 15b-16a, 73b-74a。

53 關於楊廷筠的事蹟與研究，參見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 年），冊 1，頁 217-237。N. Standaert,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88).

54 吳應明先捐俸三十金，增置院田，後潘濬又得九十餘金，徐振雅又捐四十金，黃與參益助十金，都為增置院田之用。見劉元卿，〈復古書院續置田租〉，《劉聘君全集》，卷 7，頁 18b。

(1603-1604)重新修葺。⁵⁵此時，又在尊經閣東方興建過化祠，祀周怡(1506-1569)，後增祀湛若水(1466-1560)和倪凍；並將二賢祠遷建於尊經閣西方，易名同德祠，除原三主外，加祀劉邦采、歐陽瑜⁵⁶、劉陽、尹一仁⁵⁷、彭簪⁵⁸等吉安府名儒，後來又增祀王時槐、鄒德溥、鄒德泳，共十一主。⁵⁹天啓五年(1625)毀書院之際，知縣高賚明將之改爲勳賢祠。明末復古書院毀於兵，入清後，書院的堂廊部分於乾隆七年(1742)重修，並復得田租；尊經閣與同德、過化二祠，也幾度重修。⁶⁰

縱觀有明一代，即使講學風氣因時勢而有興衰之變，青原、復古仍然是江右理學家最重要的維繫地，鄒守益身後，劉邦采、鄒德涵、鄒德溥兄弟、胡直、王時槐、鄒元標等人，於隆慶(r. 1567-1572)、萬曆(r. 1573-1619)年間重振了青原山的講學，⁶¹《廬陵縣志》對晚明青原山會講不斷的情形記道：「厥後塘南王時槐、廬山胡直、龍山劉方興、兩峰劉文敏、緒山錢德洪、瀟瀟劉元卿、龍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繼會青原。」⁶²

至於青原山會館祠祀的建立，本來鄒守益、羅洪先是利用青原勝地聚同志講學，並無意要蓋理學的會館，即使稍後胡直、王時槐等主盟時亦然，不過後來因「當道諸賢欲光大吾道」，遂在僧舍右邊蓋了先賢祠，但此祠偏隘，又在僧舍旁，極不協調，萬曆年間鄒元標和郭子章(1542-1618)遂盡除原祠，以原地歸還青原，移建會館於前山，並修建五賢祠，祀王陽明、鄒守益、羅

⁵⁵ 傅應禎，〈重修復古書院記〉，《安福縣志》（同治 11 年刻本），卷 17，頁 33a；王時槐，〈重修院古書院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3，頁 31b-34a。

⁵⁶ 歐陽瑜，字汝重。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16a-b。

⁵⁷ 尹一仁，字任之。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14b-15a。

⁵⁸ 彭簪，字世望，正德二年舉鄉，爲衡山令。晚年與羅洪先、鄒守益講學。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13b-14b。

⁵⁹ 《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3，頁 6a。

⁶⁰ 《安福縣志》（同治 11 年刊本），卷 5，頁 8b-9b。

⁶¹ 羅大紘：「青原會講始於鄒文莊、羅文恭兩先生，……後劉獅泉、胡廬山、王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羅大紘，〈青原鼎革議〉，《紫原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卷 8，頁 22a。

⁶² 《廬陵縣志》（乾隆 46 年刊本），卷 18，頁 45b。

洪先、聶豹、歐陽德。⁶³清初施閏章(1618-1683)守湖西，遊青原而感歎會館荒落，重修傳心堂和五賢祠，祠的北方有各邑所立的會館，又於祠左右各建一書室，令學者設席其間，可以坐而誦，可以眺而吟。⁶⁴施閏章的祖父是宣城理學家施宏猷，主領宣城的同仁會，⁶⁵施閏章的學術興趣雖然已轉向古學，但理學的家學傳統影響仍強，在他的興發帶導下，白鷺州書院和青原山再舉講會，「一時山中父老扶杖而來，環橋千人，三日乃罷，有聞而流涕者甚矣，斯道之不遠于人心也。」⁶⁶這應該是講會風潮衰退前的一點餘波盪漾，因為三年後李元鼎記道：「因憶三年前愚山倡道，鐘鼓為新，集數郡人士於一堂之上，反覆辯難，不減當年從遊鄒忠介師時，今彈指間堂前又復草深矣。」⁶⁷

安福縣南方的學者在接受陽明學上有自己的傳承，與鄒氏學者互相輝印，共開講會風氣，稍後更將講會規模帶入廬陵。陽明學的第一個講會——惜陰會——即成立於安福的南鄉，由劉邦采等人於嘉靖五年(1526)組成。⁶⁸安福縣南鄉三舍的劉氏家族是當地的望族，他們接觸陽明學的機緣是族人中的劉曉(1513舉人)曾在南京受學於陽明，並與徐愛(1488-1518)、薛侃(1517進士)等人往來切磋，時為王陽明任南京鴻臚寺卿之際(1514-16)。⁶⁹後來劉曉回到安福，也將王陽明的著作和學說帶回安福。此時劉文敏和從弟劉邦采在鄉共學，於宋儒格致修身之學已有用心，從劉曉處得陽明論學語數條後，對王陽明異於宋儒「格物致知」之說格外費心，稍有所悟；又讀《傳習錄》，因自覺「動靜未能合一」，於是買舟帶領弟姪共九人到了浙江，拜謁王陽明

⁶³ 釋笑峰等撰、施閏章補輯，《青原志略》，卷3，頁1a。《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3，頁5a-b。又見羅大紘，《青原鼎革議》，《紫原文集》，卷8，頁22a-23a。

⁶⁴ 《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18，頁47b。

⁶⁵ 見《施愚山先生年譜》；施閏章，《施氏家風述略》（清康熙至乾隆間刊本，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亦見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卷12期1（2001年），頁53-112。

⁶⁶ 釋笑峰等撰、施閏章補輯，《青原志略》，卷3，頁17b。

⁶⁷ 李元鼎，《青原山觀瀑小記》，《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刊本），卷56，頁29a。

⁶⁸ 《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書》（四），頁144。

⁶⁹ 《安福縣志》（康熙18年刊本），卷3，頁13a-13b。《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書》（四），頁91-92。

而師事之，前後有三年之久。⁷⁰從《王陽明年譜》中我們得知他們參與嘉靖三年(1524)浙江稽山書院中的講學。⁷¹劉文敏、劉邦采等人回鄉後成爲傳播陽明學的重要學者，率先組成了惜陰會，根據劉曉的〈安福惜陰會志引〉所敘：

天啓斯文，篤生我陽明夫子大明聖學，吾邑士從游者殆數十人，四鄉豪杰駸駸興起，蓋有未及門而所立卓然者，誠一時之盛也。曉之事夫子也最早，愧無以爲諸君子倡，因念生也異方，不能往受教而在鄉也，又勢各有便，不能聚一，懼夫離群索居，固有因而怠焉者矣。乃與諸同志立爲惜陰會，期以各雙月望日輪，有志者若干人主供應，擇地之雅勝居焉，互相切磋，各殫厥心，盡五日而散。與會者非有大故，不得輒免。孔子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聚友惜陰，尤夫子拳拳之教也。⁷²

這種因爲不願離群索居、獨學無友，而在自己鄉黨中創造朋友相聚論學環境的作法，成爲後來所有陽明講會組成的理由和模式。而除了惜陰會外，劉氏學者也與鄒守益等共同領導青原會和復古書院內的講學活動。

劉邦采於嘉靖七年(1528)成舉人，曾任壽寧教諭，後陞嘉興府同知，不久即致仕歸鄉，與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等地。⁷³劉文敏一生未仕，卻受到士大夫的尊重，徐階任江西學政時曾力聘入試、貢於禮部，但劉文敏固辭；聶豹最敬信他，稱讚道：「海內真布衣，兩峰一人而已。」⁷⁴早期南鄉的重要學者尚有劉陽，劉陽先從學於彭簪⁷⁵和劉曉，後又到虔臺謁見王陽明稱弟子，並曾與冀元亨(1482-1521)互相稽切數月。劉陽於嘉靖四年(1525)

⁷⁰ 《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刊本），卷 3，頁 4b-7a，頁 280-285。

⁷¹ 《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書》（四），頁 133。

⁷² 轉引自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頁 325。

⁷³ 《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12，頁 4b。

⁷⁴ 同上，卷 12，頁 4b-5b。

⁷⁵ 彭簪，字世望，東鄉松田人，正德丁卯(1507)舉於鄉，爲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後轉仕常州、靖州，致仕歸鄉後築玩易草堂，構臥雲亭於石屋上，鄒守益時與劇談。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13b-14b。

舉鄉試後，先任碭山知縣，後拜福建道御史。嚴嵩(1480-1569)當國，欲親之，劉陽卻引疾歸；徐階當國，推光祿寺少卿，不起，居鄉與邑人士談學。晚年在三峰上關建雲霞館，與諸同志講道不輟。黃宗羲推崇他是繼鄒守益之後江右的學術領袖：「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為歸。」⁷⁶

這些南鄉學者起初於松雲庵有松雲會的聚講，後由鄒守益倡議，劉邦采、劉陽、尹一仁、周儒等人在北真觀廢址上謀建書院，復真書院終於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落成。⁷⁷書院的結構為：前後有樓，中堂有廡，東及四層，層各五間，左右翼以廂房。堂匾為砥德礪材，樓名為萃勝，後樓名為聚奎，為惜陰會同志聚講之所。⁷⁸書院中有藏書閣，書籍由各鄉紳學者及同志們所捐，為數頗可觀，並置有院田。⁷⁹

根據清代的方志，後來復真書院萃勝樓的右方建了兩祠，分別祭祀劉邦采和王時槐。聚奎樓中祀劉文敏、劉邦采、劉陽、尹一仁四主；樓後為堂祀鄒守益，陪祀者為劉曉、劉肇袞、王皦、朱意。⁸⁰這些都是安福縣南方重要的學者，祭祀對象反映了復真書院與當地學術的密切關係。書院於張居正禁學和東林之禍時均有損毀，雖嘗試修復，但明末時已圯毀，僅遺聚奎樓。⁸¹入清後，康熙三年(1664)曾重修書院，並加祀朱世守；乾隆八年(1743)再度重修，又於院左添建魁星閣，二十七年(1762)復修萃勝樓。

復真書院初創時，主要是講會式的書院，書院除舉行地方性小會外，每歲有一大會。大會中經常有來自四方的學者參與，根據劉陽的記載，嘉靖四十二年除夕(1564)共有二十三人參加，而劉邦采記錄嘉靖四十三年除夕事，

⁷⁶ 《明儒學案》，卷 19，頁 443-444。亦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3a-4b。

⁷⁷ 見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頁 327。

⁷⁸ 同上，頁 328。

⁷⁹ 書籍卷數據稱「書數千卷」，同上，頁 328。縣志中記王仕翹置田復真書院以贖學者。見《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刊本），卷 3，頁 71b-73b。

⁸⁰ 根據《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此四人是據復真會冊所記，若按舊志，則陪祀者為：朱調、王釗、王鑄、朱叔相。見《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5，頁 8b。

⁸¹ 《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5，頁 8b-9a。

有來自各地的學者共聚一堂：

已而忽報廬陵周原山至，攜其子性命旼、命官、德進，並其受業者吉水王汝玉、蕭章節、蕭汝宣、彭德天凡七人，乃廿五日也。越三日又涇邑吳竹山、太平杜了齋偕其弟龍崖、婺源詹東鏡、廣德濮省愚，了齋有徒太平杜汝緝、青陽陳行甫，凡七人。越二日又金溪徐居安攜其徒昆山歸和甫、胡維靜、祁門李如梅、陳子樂，凡五人至。暮夜泊舟，明晨登岸，既而異者永新顏監甫、廬陵李茂春也。越明日，湖山之宗人尹汝楠、尹時卿來自永新。尹以用、朱汝治、朱以相、王思正、劉唐益又次。而康子敬、王正吾、康國用維是同志之掌歲事者。康徵夫、朱純甫乃率其子弟僮僕以供事。徵夫之仲子士栻童而執事，雖煩不怠。主賓交歡于一堂……元旦之明日，永新顏山農攜其子賓無忘勞于披雪之訪，乃共語除舊佈新云。⁸²

嘉靖三十、四十年代，講學風氣正興盛，江右居於領導地位，江右學者的學識與聲望，向來吸引四方學者，由上文更可見當時各地陽明學者機動性游學聚講，群聚江右的情形。

劉氏學者的傳人不少，根據萬斯同(1638-1702)的《儒林宗派》，劉文敏門人有王時槐、陳嘉謨、賀涇（1547進士），再傳弟子有賀沘（1570舉人）、劉日升、聶尙恒、康時升、錢一本。⁸³劉陽的門人則以劉元卿最著名。下文將分述王時槐與劉元卿二人在晚明所興發的講會活動。

王時槐弱冠時師事劉文敏，與廬陵的陳嘉謨等人一同講學，⁸⁴也追隨鄒守益講學。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時槐年僅二十六歲，便考取進士，後歷任南京兵部主事、員外郎、禮部郎中、漳南兵巡道事、尚寶司少卿等職。五

⁸² 引文轉引自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頁330。

⁸³ 萬斯同，《儒林宗派》（於《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3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頁902。

⁸⁴ 據稱陳嘉謨先師事劉文敏，以其說語王時槐，王時槐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十七人，共學兩峰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見《廬陵縣志》（民國9年刻本），卷19上，頁7a。

十歲時，以陝西參政致仕，往後居家三十餘來，專致講學。⁸⁵王時槐晚年除了主講於青原、復真外，主要講學地是廬陵縣的西原，陳嘉謨是他最重要的學友，兩人不僅少時共師劉文敏，又同於 1547 年考取進士，致仕時間相近，且同樣居鄉講學三十餘年。兩人學識聲望相當，共同講學印證時間又長，帶領門人亦最可觀。不過，在學術性格上兩人則不同，王時槐之學圓融高超，陳嘉謨則篤質樸實，鄒元標稱其「是邊明邊暗輩，無大開眼目」。⁸⁶

王時槐和陳嘉謨所創的西原惜陰會是晚明江右相當活躍的講會，此會始於隆慶元年(1567)，利用西門外能仁寺聚會，故又名能仁會，據賀沚所記：

西原惜陰之會始於隆慶丁卯(1567)，先師塘南王先生暨蒙山陳先生實倡之，少龍賀先生、如川劉先生、少梧鄒先生、述亭劉先生、鳳閣鍾先生贊助之，先輩則安成兩峰、獅泉二劉先生、廬陵羅山原山二周先生、見川劉先生，咸臨講席，一時稱盛。惜陰之名，授之兩峰先生而命自文成王公者也。萬曆庚辰(1580)乃始有田，癸未(1583)乃始有館。⁸⁷

可見西原惜陰會的名稱基本上延用安福的惜陰會，當初是王陽明所命名，王陽明並著有〈惜陰說〉相勉勵。⁸⁸從名稱以及實際師承關係看，這個會都可說是劉文敏等人講學所結出的成果。有關參與講會的學者，領導者是王時槐和陳嘉謨，贊助者包括劉學朱⁸⁹、劉教(1506-1574)⁹⁰、以及賀少龍、劉如川、

⁸⁵ 王時槐生平，參見《明儒學案》，卷 20，頁 468-469；《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11，頁 5b-6a。

⁸⁶ 鄒元標，〈答劉雲嶠太史〉（二），《鄒子願學集》（東京高橋情報據明萬曆 47 年序刊本影印，1990 年），卷 3，頁 15a。

⁸⁷ 《廬陵縣志》（民國 9 年刻本），卷 14，頁 16a。

⁸⁸ 王守仁，《王陽明全書》（一），頁 165-166。

⁸⁹ 劉學朱，字道明，號述亭。其生平與學旨，見《廬陵縣志》（乾隆 46 年刊本），卷 30，頁 16a-17b。

⁹⁰ 劉教，字道夫，號建川，或見川。曾任泰興江陰教諭、梧州知府，晚年闢芝園山房，隱其中，與周祿、陳嘉謨諸君訂西原惜陰會。《廬陵縣志》（乾隆 46 年刊本），卷 30，頁 14b-15a；又見胡直，〈梧州知府劉見川先生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6，頁 1a-5b。陳嘉謨亦有記，見《廬陵縣志》（乾隆 46 年刊本），卷 39，頁 17ba。

鄒少梧、鍾鳳閣等人，⁹¹而起初老師輩劉文敏、劉邦采，以及廬陵長輩周祿⁹²、周祉，也都參與。另外從方志記載則可知：廬陵年輕學者賀沚⁹³、郭育顯⁹⁴、陳鍾⁹⁵、劉叔鼈、劉日升⁹⁶等人，師事王時槐，也熱切參與此會。此會於萬曆八年(1580)開始置有會田，以供會事之費，又於萬曆十一年(1583)興建西原會館。⁹⁷

西原會館中的體仁堂成於萬曆十五年(1587)，同志士友講學其間，此會每年舉會八次，小會的會期是三日，每年秋季(九月)集九邑及門者為大會

⁹¹ 此四位學者尚無法找到傳記，亦不能斷定其名。

⁹² 周祿，字以道，號羅山，受學王陽明。以貢歷青陽訓導，黃岡教諭，曾於京師與聶豹同講學一年，深契，回鄉後與同志訂西原惜陰會，風雨寒暑必赴。周祉為其弟。見《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30，頁13a-b；聶豹，〈贈周以道分教青陽〉，《雙江聶先生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4，頁20a-22a。

⁹³ 賀沚，字汝定，隨王時槐講學，時槐卒，賀沚心喪三年，益以斯道為己任，主持西原惜陰會，與鄒元標講學青原白鷺間。其傳見《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30，頁18b-19b。

⁹⁴ 郭育顯，號筆峰，受業於劉學朱，講學西原。其傳見《廬陵縣志》(1920年刻本)，卷19上，頁8a。

⁹⁵ 陳鍾，師事王時槐，與師講學青原白鷺之間，鄒元標雅重之，又曾講學吳越間，與焦竑為性命友，晚年結茅獨坐，蔬水嘯歌以終。見《廬陵縣志》(民國9年刻本)，卷19上，頁8a-b。

⁹⁶ 劉叔鼈，字而強，師事王時槐，研究性理，萬曆年間以貢選知樂會，月集士紳辟廡講學為常，病歸，貧如初。劉日升，字扶生，號明自，萬曆庚辰進士，累官至應天府尹，引疾歸，杜門卻掃。師事王時槐，晚年日守一編以自娛。見《廬陵縣志》(民國9年刻本)，卷19上，頁9b-10b。

⁹⁷ 見《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18，頁49b-50a。另外，有一惜陰會館位於吉安府府治(廬陵縣內)南方江邊，於1579年左右改建王時槐講學根據地。此禪寺原是王時槐過去讀書之地，根據王時槐自己所述，大約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時，他 very 希望找一遠離市囂、僻靜之處以精研學問，後來找到郡城近郊的金牛禪院，此地背郭面江，因為路徑險阻、僧舍敝陋殘敗、無丹堊之飾或結構之巧，所以人煙罕至。王時槐喜歡此地靜闊樸質之氣，遂寓榻於其間。二十年後，王時槐居鄉講學，門人漸多，於是將舊讀書之處加以整葺，建成內省軒、崇正堂、高明光大廳，並題為惜陰會館，又關門通徑使往來方便。王時槐與弟子經常講學其中，不過在王時槐去世後，禪寺毀壞不堪，後有一僧發弘願欲振新之，每日持齋誦經禮佛拜懺，一準於禪者之威儀，寺門因之改觀，寺院又經重修，煥然一新。見王時槐，〈惜陰會館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3，頁30b-31b；羅大紘，〈重修金牛寺記〉，《紫原文集》，卷7，頁35a-36a。

五日。⁹⁸後來人數漸增，萬曆三十一年(1603)，王時槐的弟子賀泚與講學同志們商定擴建，他們看中了體仁堂西北能仁寺善法堂後面的一片空地，向寺僧購地後，增建敬止堂，於次年(1604)完工。⁹⁹西原惜陰會設有會籍、會規，也有會志，¹⁰⁰王時槐〈書西原惜陰會籍〉：「……廬陵賀子汝定、劉子文光、偕泰和曾子德卿，謀合同門諸友訂為每歲季秋能仁之會，爰置會籍，首揭條規，以明義聚，次列姓名，齒序以重心盟。每會紀其來赴，以稽勤篤。」¹⁰¹

王時槐眾多弟子中，以賀泚為主要繼承人，據羅大紘（1586 進士）所記，王時槐晚年時，賀泚捨官歸來，朝夕侍坐聽講，以首座弟子自任，興發不少人，當時遊時槐門下有數百人之多，日侍講者數十人。賀泚侍奉王時槐如子事父，王時槐病，他親奉湯藥；卒，他制三年服守心喪三年，同門感其誠，亦有若干人從之服心喪三年。之後，賀泚便擔負起主持西原惜陰會的重責，他「捨家居西原，守體仁書院，奉王先生主，為月一會，聚同門老友及北面定齋〔即賀泚〕者，拜謁王先生，講師學數日乃罷。而定齋罔起，遂以西原為家，視其家如客舍。」¹⁰²賀泚年六十尚無子，朋友勸其納妾，但他選擇專力於講學，維繫師門傳承，他說：「誰不作官？為無父母後者，尚有諸兄。若離師、去師舍，使道不傳而絕吾師門一脈，則吾之罪大於一與不忠也。」¹⁰³在賀泚與其接棒者劉海禹的努力下，西原惜陰會仍維持每歲季月小會，九月大會。然而，賀、劉二人相繼去世後，講學風尚驟衰，「田畝荒蕪而講地仍鞠為茂草矣。」加上書院之講堂書室又於崇禎二年(1629)毀於火災，大約

⁹⁸ 王時槐，〈西原敬止堂記〉、〈西原會規十七條〉，《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3，頁42a-44a；卷6，頁17b。

⁹⁹ 敬止堂之建費百餘金，倡建者為王時槐門人賀泚等，見劉孔當，〈題西原敬止堂歛金簿〉，《劉喜聞文集》，卷10，頁10b-11a。

¹⁰⁰ 王時槐，〈能仁會志序〉，《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3，頁15a-16a；〈書西原惜陰會籍〉，《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1a-2b；〈西原會規十七條〉，《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14a-20a。

¹⁰¹ 王時槐，〈書西原惜陰會籍〉，《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1a-2b。

¹⁰² 羅大紘，〈賀定齋先生七十序〉，《紫原文集》，卷5，頁15a-17a。

¹⁰³ 同上註。另外，廬陵縣儒行鄉的復初書院也是賀泚的講所，性存書院則專祀賀泚，由此可知其與儒行鄉講學的密切關係，見《廬陵縣志》（1920年刻本），卷14，頁22a, 23a。

二十年後才由鄉紳和地方官共同出力，將之重建。¹⁰⁴

王時槐講學西原，不僅凝聚了當地講學的風氣、培養許多年輕學者、也創造了廬陵縣陽明講會的高潮，雖然廬陵早期也有陽明學者，如劉冕、劉輅、周祿、周祉、彭炳文等人，¹⁰⁵這些人或親隨王陽明學，或與聶豹、鄒守益等人往來，但並未能形成一個以廬陵本地為基礎的講學中心，西原惜陰會的成立則成功地凝聚了廬陵的學者，與安福南鄉的陽明學傳統連繫，使陽明講會活動得以在面對張居正禁學的局勢下，有力地持續開創。

除前文所述，我們從王時槐的文集中尚可見到一些講會，例如由安福的康日觀、彭南之、王宗周等人發起組成的輔仁會，性質介於文會和講會之間，「以身心之學交相砥礪，以詞藝之課兼為操習。」¹⁰⁶廬陵縣有一淡江會，由蕭姓叔姪和王時槐弟子們共同聯會，是講究習靜切磋的理學講會。¹⁰⁷我們也看到類似西原惜陰會的會規深入著名的白鷺洲書院，在〈續白鷺洲書院正學會條三條〉中，王時槐規定與會者赴會時要「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攝，此心昏昧何以開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飭；」「會日以靜坐澄心，操存涵養為主，勿身在會堂，心馳會外，勿閑談俗事，偏執己見。」正與西原惜陰會的規定相似。¹⁰⁸

晚明另一位安福講學大將是劉元卿，劉元卿小王時槐二十二歲，是安福縣西鄉南陂人。西里因地處遠僻，距城郭幾二百里，與其他書院距離亦遠，士人中接觸理學者原少，劉元卿可以說是此地推動陽明講學、興建書院的第一人。劉元卿進入理學有二個機緣：生病和鄒德涵等人的興發。根據劉元卿自述，他於1562年（十九歲）得奇病，病中愧恨自己素平之所為，病癒後則念念欲求師問友，後研讀《傳習錄》並付諸實踐，在努力求心體的長久操

¹⁰⁴ 見劉遇奇的序，於《廬陵縣志》（乾隆46年刊本），卷18，頁51b-52b。

¹⁰⁵ 見《廬陵縣志》（民國9年刻本），卷19上，頁5b-6a。

¹⁰⁶ 王時槐，〈書輔仁會簿〉，《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29a-31a。

¹⁰⁷ 王時槐，〈書淡江會簿〉，《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34b-35b。

¹⁰⁸ 王時槐，〈續白鷺洲書院正學會條三條〉，《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6，頁42b-43b。

持後，亦有所見。¹⁰⁹他也曾說：「予自庚午(1570)從鄒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開入，始知用力於學。」¹¹⁰此時除了自學外，他開始與鄒德涵、劉應峰(1526-1586)¹¹¹等相聚講學，¹¹²雖然劉元卿與江右學者往來密切，他正式師事劉陽，不過耿定向對其學影響極深。他自認學問進一步開展的關鍵在於萬曆二年(1574)遊學於徐用檢(1528-1611)，並隨徐用檢見耿定向，耿定向教之以日常之道，而不是專靜以求心體，才使他找到學問的坦途，¹¹³他說：「生誠愚闇，謬心斯道，徘徊歧徑，迷戀影響，坐費光陰，動踰十載，邇幸東學于魯原老師，南謁天臺先生，並揭坦途，反我迷路。」¹¹⁴

劉元卿一生未考中進士，卻於 1593 年以薦舉任禮部主事，但僅為官三年，便致仕歸鄉，繼續講學，因此其一生主要事業就是在家鄉講學。¹¹⁵在京師期間，劉元卿與潘士藻(1537-1600)、焦竑(1540-1620)、耿定力(b. 1541, 1571 進士)、鄒德溥等人共組學社講學。¹¹⁶至於其在家鄉講學的歷史，他曾自述：「予自庚午(1570)從鄒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開入，始知用力於學，念予里陋，欲有以動之，未得……辛未(1571)歲末，茶陵尹介卿、內弟譚習來納贄，已而彭惟馥、惟簡、德卿諸至，蓋予之妄自稱師也由諸子始。乃相與講學于頂泉寺。」可見劉元卿於 1571 年底已開始聚徒講學，此時也正是鄒德涵、德溥兄弟、王時槐、陳嘉謨等人回鄉講學之際，江右講學在新一代的領袖帶領下，又開創新的氣象。

¹⁰⁹ 劉元卿，〈簡劉養且先生〉，《劉聘君全集》，卷 2，頁 2a。

¹¹⁰ 劉元卿，〈壽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劉聘君全集》，卷 6，頁 17b-19b。

¹¹¹ 劉應峰，字少衡，號養且，茶陵人，與胡直同年（1556 年進士），又同學於羅洪先，累官至江西參議，雲南提學副使，見胡直，〈賀劉養且憲副歸省齊壽序〉，《衡廬精舍藏稿》，卷 10，頁 19a-21a；耿定向，〈明提督雲南學校按察司副使劉公墓誌銘〉，《耿天臺先生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 年），卷 12，頁 16a-18b。

¹¹² 與鄒德涵等人講學，見劉元卿，〈茶卿月會序〉、〈壽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劉聘君全集》，卷 5，頁 44b-46b；卷 6，頁 17b-19b。

¹¹³ 劉元卿，〈答劉養且先生〉，《劉聘君全集》，卷 2，頁 2b。年代見《明儒學案》，卷 21，頁 498。

¹¹⁴ 劉元卿，〈報沈少林大史〉，《劉聘君全集》，卷 2，頁 6b。

¹¹⁵ 《安福縣志》（康熙 18 年刻本），卷 3，頁 8b-10a。

¹¹⁶ 見鄒德溥，〈翰林院編修喜聞劉公墓誌銘〉，《鄒泗山先生文集》，卷 6，頁 17a。

頂泉寺講會參與人數增加，又因為茶陵¹¹⁷的尹介卿將此講會告知劉應峰，於是劉應峰和劉元卿商議合作，開始了聯合兩地的葵丘之會，據劉元卿所說：「予鄉有期會，楚土居其半；楚有會，予亦率諸聽養旦先生之教。」此時聚會士人達數十佰之多，加上地方人士也逐漸熱衷講學、熟悉講會方式，¹¹⁸因此就導致興建復禮書院的計劃。

劉元卿講學的努力，使得安福西里先後興建三所講會式書院——復禮書院、識仁書院、中道會館。¹¹⁹復禮書院於隆慶六年(1572)開工，次年(1573)完工。復禮書院的興建主要賴地方士民之力，根據《安福縣志》，書院是上西鄉二十四姓公建的，劉元卿特別記錄了金錢方面捐獻者：彭昂爲之首，而陳國相等從而翼之，劉元卿的兄弟名卿、上卿、貴卿亦力助之；奉獻力量督工者有：劉欽、彭繼善、馮夢熊。¹²⁰復禮書院的結構爲：中爲明德堂，祀王守仁、鄒守益、劉陽、耿定向四主。左爲東林觀，右爲三一菴。共捐田糧共六石零，後於萬曆十二年(1584)陳國相再捐田三十畝。劉元卿去世後，增祀於書院的明德堂。¹²¹後來書院於同治九年(1870)重修，結構改爲：左爲留帖閣，右爲集賢館，後爲崇德堂，祀二十四姓基祖。¹²²

復禮書院的興建使得講學更落實於地方鄉里，從劉元卿之姪劉孔當（約1558-1605）¹²³的文集我們可以看到像復禮書院這類村里規模的書院的確使

¹¹⁷ 茶陵在湖廣，位在吉安府西方。

¹¹⁸ 〈復禮書院記〉記載當地父老本以爲講學之事甚高難，在劉元卿的傳講鼓勵下，開始相信人人皆有可爲，講會從季會開始，到後來感覺每季五日之會不夠，終於醞釀書院之建。見劉元卿，〈復禮書院記〉，《劉聘君全集》，卷7，頁1a-3b。

¹¹⁹ 鄒元標爲劉元卿撰寫的墓誌銘中說：「而所創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可見是講會式的書院，而各版本方志均無記載一德書院，可能指一德會，劉元卿在〈一德會規引〉中說此會是王嚴張謝共組而成的。見鄒元標，〈明詔徵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瀟劉公墓誌銘〉，《鄒子願學集》，卷6，頁29a；劉元卿，〈一德會規引〉，《劉聘君全集》，卷9，頁3b。

¹²⁰ 同上註。

¹²¹ 《安福縣志》（乾隆47年修本），卷3，頁9b。

¹²² 《安福縣志》（同治11年刊本），卷5，頁11a。

¹²³ 劉孔當，字任之，號喜聞，1592年會試第三。其傳見鄒德溥，〈翰林院編修喜聞劉公墓誌銘〉，《鄒泗山先生文集》，卷6，頁16a-20b。

得講學更深入基層，也與地方宗族有密切關係。有許多地方人士熱切地參與，例如劉本振一生無功名，喜任俠，他在劉元卿倡學復禮書院後，往從受教，因聞聖人可學而至，躍然喜曰：「吾乃可為聖人，寧渠羨咕嗶子。」「因遂折節力學，復禮距公舍百里，然會往往必竟會罷乃歸。」¹²⁴劉弘達也是劉氏家族的一員，居家距復禮書院八十里之遙，由於家貧，無法具輿馬，只能徒步擔簦前往參與，但仍不改其與會的熱誠，會畢，「歸而宣其所聞以訓諸未至者。」¹²⁵就因為距離的關係，許多住在距書院八十至一百里之遙的人士，往返於書院講學必需住宿並自備糧食，非常不方便，如此長距離也阻擾了許多人前往的意願，因此在復禮書院興建後的二十年，安福西部又建了第二所書院，即識仁書院。

識仁書院座落在復禮書院東方約八十里處的九都地區，主要倡議者是當地的劉孔當和周惟中，二人均為王時槐的學生。¹²⁶又獲得縣官吳應明的幫助，利用鄉人王師仁本欲捐做浮梁的百金為基金，並獲鄉紳父老的支持，於萬曆二十年(1592)完工。¹²⁷識仁書院建築結構：中為志學堂，前為復初堂，右為傳心堂，左為養性齋。復初堂左右各為依仁堂、輔仁堂。後又建三先生祠於志學堂後，祀劉元卿、周惟中、劉孔當，並以西里諸賢陪祀。¹²⁸入清後，書院曾於康熙二十年(1681)和乾隆十九年(1754)改建重修。¹²⁹

識仁書院中的講學領袖主要就是劉孔當、周惟中、劉學古，又有劉禾泉、周靜所、謝訓菴、吳雲屏、周學堯等人參與，為使講學與教化更落實，劉氏

¹²⁴ 劉本振，字思德，別號雙潭，從劉元卿講學，是劉氏家族的一員。晚年津津嗜學，什九於識仁書院，什一家居，家居時又集子弟月一再會，讀約申法。見劉孔當，〈雙潭公傳〉，《劉喜聞文集》（東京高橋情報據明萬曆 39 年陳邦瞻校刊本影印，1993 年），卷 4，頁 16a-19b。

¹²⁵ 劉弘達，字孚之，號西野，別號念行。是劉孔當的族叔，其行以愨著。見劉孔當，〈冽井公墓誌銘〉，《劉喜聞文集》，卷 5，頁 15a-18b。

¹²⁶ 關於劉孔當、周惟中，以及劉學古同王時槐講學，見劉孔當，〈賀學古劉先生七秩序〉，《劉喜聞文集》，卷 2，頁 6a-9a。

¹²⁷ 劉元卿，〈識仁書院記〉，《劉聘君全集》，卷 7，頁 3b-5b。

¹²⁸ 同上註。

¹²⁹ 《安福縣志》（同治 11 年刊本），卷 5，頁 10b-11a。

家族更進一步創舉家會，舉會原因據劉孔當言：「吾家自瀟瀟叔倡學於復禮識仁之間，蓋謁暨而從者甚衆，顧二書院歲僅一會，外是率索居，而會時家之尊幼多以事妨，或雖無妨而徒步不便者皆卻而不得往，俱以不獲聞教爲歉。」¹³⁰因此，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夏，家族中的領導者倡議紹明劉元卿之教，月舉家會。¹³¹這個講會僅容許劉氏家族成員參與，會期以每月中旬爲定，每月由值會之團發帖各團知會，俱於各團小宗祠內舉會，與會之日以巳時集會，會中除宣讀家約外，又誦讀小學經傳一章，可互相質正，但禁止議論爭勝，以靜肅爲要求。會日也禁止謁私宅等活動。與會者需各帶白米二升付會主，值會者將供應午晚便餐。無故不參與者、值會而退托違期不舉者，均罰銀。¹³²

第三所書院是中道會館，地點在復禮書院和識仁書院的中間，距兩書院各約四十里，興建的時間是萬曆三十一年(1603)。此地爲復禮和識仁兩書院間往來必經之地，若成立講學據點，不僅減輕參與講會者旅途往返的辛苦，對於聯絡兩書院也有所貢獻，因此由當地諸生趙思菴、郁達甫發起，在地方官和鄉紳父老的幫助下完成。¹³³中道會館的建築結構爲：中爲專致堂，祀先聖；後爲崇德堂，前爲歌滄樓。乾隆時代修的縣志記載，中堂祀劉元卿，左右從祀趙篤軒等鄉賢共三十五人。中道會館置有院田，田租每年二百一十八桶二斗。¹³⁴

另外，劉元卿說：「邇日吾里抑何其會之數也，曰麗澤、曰志仁、曰陳氏家會、曰楊氏家會，乃至王嚴張謝則又有一德會，是何會之數也。」¹³⁵可見此時西里除了復禮、識仁、中道會館內的講會外，尚有許多小型的講會，如復禮月會，每月初五、廿五在劉氏家祠舉行；又如劉孔當家族的家會；或

¹³⁰ 劉孔當，〈家會引〉，《劉喜聞文集》，卷 12，頁 10a。

¹³¹ 同上註。

¹³² 劉孔當，〈家會條規〉，《劉喜聞文集》，卷 12，頁 11b-13a。

¹³³ 劉元卿，〈題修中道會館募書〉，《劉聘君全集》，卷 12，頁 37a-38a。《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3，頁 9b-10a。

¹³⁴ 《安福縣志》（乾隆 47 年修本），卷 3，頁 9b-10a。

¹³⁵ 劉元卿，〈一德會規引〉，《劉聘君全集》，卷 9，頁 3a-4a。

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的小會，如生員鄒子允和幾位同伴共組了謀道會，在識仁書院的講會中遇到劉元卿，並請劉爲之寫會籍引言，即是一例。¹³⁶

除了上述的講會外，安福縣於明中葉以降所建的書院、會館、書屋尚有許多，較具規模者有東方的道東書院，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由劉淑唐¹³⁷偕鄉紳建成，萬曆三十二年(1604)，周懋相¹³⁸將書院遷徙至附近更開曠的沙園，又擴增之，中爲講堂，後爲饌堂，左右協廳各五間。¹³⁹北方有宗孔書院，是北鄉學者和大家族襄助鄒善等共營建，後鄒德溥、德泳與地方學者曾募款重修之。¹⁴⁰學者個人所建的讀書處：東方有鄒守益所建的東陽行窩、彭簪建的石屋山房；北方有趙新建的天香會館、鄒善的講學所在任仁精舍；南方有劉曉建的梅源書屋、朱叔相建的近聖會館、尹一仁建的南林書屋、劉瑗建的五齋、周儒建的松雲窩；西方有張鰲山建的兼山書屋。¹⁴¹

綜上所論，安福縣是江右陽明講學的首善之區，青原會和復古書院是凝聚全吉安府、甚至整個江右陽明學的重要會所，但青原會和復古講會的興盛則是奠定在縣內各鄉惜陰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由較長時間的觀察，配合地理分佈的分析，我們可以看見陽明講學活動在安福縣的發展。

不同時期青原會和復古講會的主盟者即是當時江右陽明學的重要領袖，而青原會和復古書院的興衰也充分反映了政治對講學的影響。王陽明於1528年逝世，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聶豹、歐陽德等於1530s-1540s年間共同開創了青原山最興盛的講學時期，復古書院也在此時興建，成爲陽明學術在江右最鮮明的代表，鄒、羅、聶、歐等人是王門第一代弟子，也是此

¹³⁶ 劉元卿，〈謀道會籍引〉，《劉聘君全集》，卷9，頁5a-6b。

¹³⁷ 劉淑唐，號養沖，東鄉陽屯人，曾任祁陽縣令，後居鄉倡學，歿祀道東書院。傳見《安福縣志》（康熙18年刊本），卷3，頁19a。

¹³⁸ 周懋相，字弼甫。其傳見《安福縣志》（康熙18年刊本），卷3，頁78b-79a。

¹³⁹ 王時槐，〈道東書院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3，頁35b-38a。道東書院後祀李時勉、劉實、彭簪、劉肇袞、劉淑唐、周懋相，入清後曾二度重修，見《安福縣志》（同治11年刊本），卷5，頁10a。

¹⁴⁰ 見鄒德溥，〈重脩宗孔書院募藉引〉，《鄒泗山先生文集》，卷5，頁6a-7a。

¹⁴¹ 《安福縣志》（乾隆47年修本），卷3，頁10a-11a。

時江右陽明學的重要領袖。青原會從 1533 年首次召集以來時有聚會，至少於 1546、1548、1557 年間均有聚會，¹⁴²在鄒守益晚年及去世之後的 1560s，此會漸衰，鄒德涵於 1569 年再度倡學於青原，興發了劉元卿等年輕學人，緊接著南鄉學者王時槐於 1570s 初期回鄉講學，王時槐與劉元卿成為安福新一代的學術領袖，他們帶領講學活動在面對張居正禁學的嚴厲考驗下，繼續生存，伺機再發。

1579 年江陵禁學的行動對復古書院造成重創，書院因此失掉大部份院田，被迫改為祠祀。學禁之後，1583 年鄒元標上疏請復張居正所毀之書院，不久王陽明亦獲准陪祀孔廟，各地陽明講會和書院都有再興的跡象。¹⁴³復古書院亦於此時恢復書院名稱和部分規模，院田雖經清復，但卻要等到 1603 年書院才正式重修，次年才修葺完成。然而書院在經歷 1625 年魏忠賢毀書院的浩劫後，又再次歷經明末兵禍，幾乎全毀，雖然書院的堂廊部分在 1742 年重修，但已與晚明講學活動無關。

從縣內的地理分佈而言，安福縣東、北方的講學以鄒守益家族為依歸，鄒氏家族進士連連、至少五代傳承理學，六十餘年主持東山會的講學，其最主要的經營所在則是復古書院；南方主要靠劉邦采、劉陽等學者的領導和傳承，不僅在南鄉成功建立地方性小規模的講學的模式，其門人王時槐和劉元卿更將地方惜陰會的模式分別擴展到廬陵與安福西鄉，在 1570s 到 1600s 年間，面對張居正禁學的壓力，仍帶出蓬勃的講學活動。

三、吉水

吉水的學者中，對陽明講學活動最有影響力的當首推羅洪先和鄒元標。羅、鄒兩人分別是嘉靖和萬曆兩個講學時期的代表人物，他們與其他地區的

¹⁴² 見麥仲貴，〈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台北：學生書局，1977 年），頁 162, 167, 183。

¹⁴³ 〈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142，頁 4a-5b (2645-2648)。例如寧國府涇縣的水西書院、浙江紹興的稽山書院也都於此時重修，見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卷 12 期 1，頁 53-112。

學者互動頻繁，其講學影響的範圍不僅超越縣的層次，是舉國聞名的大學者，在思想內涵和實踐工夫的取徑上也啓動陽明學內部的諸多論辯和分歧，從而對講學的方式與推展、對江右陽明學的發展造成極大的衝激。¹⁴⁴

羅洪先一生沒有見過王陽明，也始終沒有以門人自居，甚至從其學問的旨趣與晚年自得的認定看來，他對王陽明之學並不像其他王門弟子一樣地服膺不悖。錢穆指出羅洪先論學著重周敦頤和《周易》，其學脈則本之朱子。¹⁴⁵古清美也認為羅洪先學與陽明學並不相契，他不以良知教法為學問的最終歸宿，而是以其對周敦頤的主靜、無欲，對程顥〈識仁篇〉和〈定性書〉的了解及所下的工夫心得來為「良知」和「致良知」作註腳。¹⁴⁶

但是，羅洪先從十五歲讀王陽明《傳習錄》至玩讀忘倦的地步之後，一生欽服王陽明之事功與學問，相信其確為聖人之學，而且終其一生與陽明弟子們鄒守益、劉邦采、王畿、錢德洪、聶豹等人交往密切、往復切磋論辯，可以說其一生學問進程是長期與陽明學對話、修正的結果。羅洪先居鄉講學二十餘年，門人眾多，其學術活動也主要在陽明講學的活動之內，不僅號召同志講學且開闢講所，因此絕對是影響江右陽明講學的關鍵性人物。

羅洪先於嘉靖四年(1525)舉鄉試，即偕王魯直、周子恭(1506-1553)師事同邑的李中(1478-1542)，¹⁴⁷李中之學主要是宋儒的脈絡，其家學與師學均可上溯濂洛，¹⁴⁸因此羅洪先論學常上溯宋儒、不獨尊陽明良知學，應有師承

¹⁴⁴ 羅洪先贊同聶豹歸寂說，引起陽明學者對良知意義的辯論，對江右陽明學的發展甚鉅。羅洪先的風格與學術對陽明學、乃至江右後學之重大影響，從鄒元標所說：「……而羅念菴先生起，尊信其（指王陽明）說，然以潔履凝操，足取信天下，新建學得先生始信。先生後有塘南王先生，言必曰文恭文恭，而靜定幽探，耆年如一，新建學又得先生一衍。」亦可見一斑。鄒元標，〈王塘南先生全集序〉，《鄒子願學集》，卷4，頁44a-45a。

¹⁴⁵ 錢穆，〈羅念菴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頁188-212。

¹⁴⁶ 古清美，〈羅念菴與陽明學〉，〈羅念菴的理學〉，《明代理學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141-207。

¹⁴⁷ 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23，頁5b。

¹⁴⁸ 李中先祖李次魚，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為復齋先生。母歐陽氏，乃歐陽修之後。李中師楊珠，是母親歐陽淑人的母舅，楊珠之學自傳註，溯濂洛，能躬理道。見羅洪先，〈明故通議大夫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平李先生行狀〉，《念菴文集》，

的影響，¹⁴⁹由此也可見在江右長期的理學傳統下，陽明學並不能獨霸整個學術領域。嘉靖七年(1528)羅洪先在赴京趕考的途中遇見何秦（廷仁，1486-1551）和黃弘綱，何、黃是江西雩都人，也是非常活躍的陽明學者。¹⁵⁰次年(1529)，羅洪先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大約就在此時，羅洪先先後結識了許多王陽明的弟子，如聶豹、王艮、王畿，又與歐陽德、徐階共事，¹⁵¹一起論學，他曾表達了當時對歐陽德的敬重之情：「洪先束髮，快睹光儀，初入禁廷，朝夕相依，語必劄記，信如蒼龜。」¹⁵²

嘉靖十二年(1533)，羅洪先歸家奔父喪，守喪期間，他廬居於附近的玉虛院，據稱是因身體孱弱，居於道院既有靜養之功，也有居廬之意，¹⁵³不久，其姪周子恭歸自南都，便於玉虛院聚友講學，成立了玉虛會，邀劉邦采來主盟。¹⁵⁴玉虛會雖未必標榜陽明學，但陽明學佔有相當份量，除了劉邦采、羅洪先已接觸陽明學外，玉虛會的會友劉方輿也心儀陽明學，且與陽明高弟何秦、黃弘綱、鄒守益、聶豹等遊。¹⁵⁵羅洪先於居喪期間活躍於講學活動引起了同邑名儒羅僑(1472-1528)的批評，此時羅洪先對朋友相聚講學的看法非常正面，他解釋自己並沒有開講，只是側坐聞其緒論，參與講學的目的在求益，又引朱子之言，說明自古居喪但不宜歌詩，絕無不許讀書之例，若三年之間無書冊朋友以培養之，恐將流於惡，是情親之遺體而不治的大不孝行爲，因

卷 13，頁 2a-b。另外，《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記楊珠之學「本之明道」，見該書卷 36，頁 10a。

¹⁴⁹ 古清美，〈羅念菴的理學〉，《明代理學論文集》，頁 171-177。

¹⁵⁰ 羅洪先說當時人有「江有何黃，浙有錢王」之風評，即以何秦、黃弘綱與王畿、錢德洪相提並論。見羅洪先，〈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善山何公墓志銘〉，《念菴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 15，頁 4b-8b。

¹⁵¹ 嘉靖九年，羅洪先見聶豹於蘇州；嘉靖十一年在京與歐陽德、徐階共事，一同講學，同年始識王畿。見錢穆，〈羅念菴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頁 188-212。

¹⁵² 羅洪先，〈祭歐陽南野公文〉，《念菴文集》，卷 17，頁 10b。

¹⁵³ 羅洪先，〈答羅東川公賁講學書〉，《念菴文集》，卷 2，頁 9b-11a。

¹⁵⁴ 羅洪先，〈與王龍谿〉，《念菴文集》，卷 2，頁 12a-13a。

¹⁵⁵ 劉方輿，字東望，號龍山，見胡直，〈平樂府節推劉公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 25，頁 16a-20b。

此斷不能絕交、避朋友之言以居喪。¹⁵⁶這段時間，羅洪先也參與青原山的講會。¹⁵⁷

羅洪先的母親卒於嘉靖十六年(1537)，父母親連續喪亡使得羅洪先從嘉靖十二年歸鄉後，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才奉召拜春坊右贊善，到京師。在這居鄉的六年之間，除了自己用功、與同志切磋講學外，他也開始授徒講業，吉水縣的羅文祥(1510-1538)¹⁵⁸、趙弼(1510-1560)¹⁵⁹、尹轍(1511-1560)¹⁶⁰、王天球¹⁶¹、王方平、周忠、謝忠孚都於此時開始跟隨他講學。可惜羅、周、謝、趙、尹等人，都比羅洪先早卒，對於吉水縣理學的發展可謂一大損失。當尹轍、趙弼相繼於1560年去世後，羅洪先痛切地說：「嗚呼，此獨文江不幸哉。前後從余遊者有羅生汝奎文祥、周生天臣忠、謝生子貞中孚，三人興致高遠。善啓發，莫如羅；謝擅才力，能群衆；而周愿介不染非義，二十年來相繼夭。兩生言及輒痛惋欲涕，嗚呼，安知今之痛惋，復有甚於兩生者乎。一邑之間信學者幾何，而傾摧若，此即後死何益矣。」¹⁶²雖然我們無法明確評估這些吉水年輕菁英的夭逝對江右陽明講學到底造成多大的損失，但仍不禁要呼應羅洪先的惋惜，想必造成相當的影響。

¹⁵⁶ 羅洪先，〈答羅東川公責講學書〉，《念菴文集》，卷2，頁9b-11a。

¹⁵⁷ 參見，〈寄薛中離〉，〈答王有孚〉，《念菴文集》，卷2，頁22a-b, 27b。

¹⁵⁸ 羅文祥，字汝奎，吉水富田里人。嘉靖十二年與弟文命同謁羅洪先於玉虛山中，後四年羅洪先與論息機之要、存性之門，忽起對曰：聞命矣。斂神卻念，忍嗜遺華，有古狂狷之風。嘉靖十六年始為縣學生，十七年卒，年僅二十八歲。見羅洪先，〈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6，頁6b-8b。

¹⁵⁹ 趙弼，字子良。於嘉靖十四年(1535)歸羅洪先門。性穎悟，曾從靜中悟入見心體常虛湛，一切無能相入，自謂得此可旁應不疑。其傳見羅洪先，〈文江兩生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5，頁8b-12b。

¹⁶⁰ 尹轍，字道輿，於嘉靖十五年(1536)歸羅洪先門。性質直樸厚、寬慈而善忍。與趙弼相友善，往來無間，寒暑徜徉石蓮雪浪之間，近而青原、玉笥、鳳林、白水，遠則衡岳、匡廬，共同講學，且結為親家。見羅洪先，〈文江兩生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5，頁8b-12b。

¹⁶¹ 王天球，字桐岡。曾游羸豹，師事羅洪先，凡所指授，務致其力。洪先曾曰：「吾得桐岡前進，即僕不落漠也。」著有日錄，皆濂洛關鍵，併多自得語。見《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36，頁12b-13a。

¹⁶² 見羅洪先，〈文江兩生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5，頁8b-12b。

嘉靖十八年，羅洪先奉召春坊右贊善，此時正好唐順之(1507-1560)奉召為春坊右司諫、鄒守益由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太常少卿，二人本約羅洪先由江西到鎮江，三人再聯舟北上，但羅洪先到鎮江時，鄒、唐已先行，此時王畿仕於南京，約羅洪先到南京，於是羅洪先開始了近三個月的旅遊，與朋友們共遊名山寺觀、隨處講學，這次的旅遊讓羅洪先寫下著名的〈冬遊記〉。此時羅洪先熱切希望從朋友講學中虛心獲益，對王畿、王艮之學也相當尊重。¹⁶³

嘉靖十九年(1540)，羅洪先入春坊進講，同年卻因上疏請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觸怒嘉靖，被除名謫為民。此後羅洪先不再出仕，二十餘年間家居吉水，1540s年間正逢鄒守益和歐陽德也居鄉，又有彭簪、劉邦采等人時相往訪，他們的講會往往有數百人之聚。¹⁶⁴

羅洪先酷愛山水，¹⁶⁵經常帶領門人出遊講學。吉水縣城北五十里處的玄潭，有崇元觀，本是道教勝地，羅洪先聚同好友人於此地「精性命之微，研天人之蘊」，後又將潭北的雪浪閣建為講所。不過根據胡直所言：「邑令王西石之誥，以羅洪先講學無所，遂脩玄潭北方的雪浪閣，既成，集士友大會，西石自是日津津嚮學矣。」¹⁶⁶則雪浪閣之建得力於縣令的幫助，興建的時間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¹⁶⁷羅大竑說當時鄒守益、劉邦采、劉陽、聶豹、及廬陵泰和諸名士，歲一再會此，每會必百數十人，此道教洞天之勝，遂為聖域。羅洪先死後，門人祠木主於閣中，歲為春秋丁會，弦歌不輟。萬曆末年，雪浪閣已毀壞，縣中學者雖欲重建，卻無力完成，1610s年間地方官捐

¹⁶³ 羅洪先，〈冬遊記〉，《念菴文集》，卷5，頁1a-19b。又參見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1-53；福田殖，〈羅念菴「冬遊記」〉，《陽明學》，號6（1994年），頁2-27。

¹⁶⁴ 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23，頁9a-b。

¹⁶⁵ 羅洪先自言：「余性淡於世味而山水之癖則莫能醫，每聞人談名勝，輒生羨心，即數千里外不憚跋涉，歸田以來，此興益濃。」見其石蓮洞紀，《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8，頁33a-b。

¹⁶⁶ 同上，頁11a。而玄潭的地理位置，見《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8，頁6a。

¹⁶⁷ 羅大竑，〈玄潭重建真君閣及脩羅文恭雪浪閣事疏〉，《紫原文集》，卷8，頁46a-48b。

金重修雪浪閣和眞君閣，並將鷺州會屬吉水的部分分一半來資助玄潭會，玄潭講學活動才再現生機。¹⁶⁸

除了雪浪閣，羅洪先又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闢石蓮洞講學。石蓮洞位於吉水縣西北七十里處，本爲一天然石穴，羅洪先發掘後，手植松竹梅柳棗桂等樹，因遠望洞類蓮花，故取名石蓮。闢洞後，羅洪先多洞居。後因來訪者日衆，在洞的東西方各建了遠塵樓和探月軒，南方建六秀堂，可容百餘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宗沐(1523-1591)、尹臺(1506-1579)助修洞屋，又在洞南建了正學堂，在洞北建觀復閣。縣志記載：王畿、錢德洪、何廷仁、黃弘綱等人往復講於此，有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達百數十人，成爲江右一時講學勝地。¹⁶⁹

羅洪先自謂：「余歸田之六年，得石蓮洞於敝廬之北，自是頓息山水之興，如醉者遇芳醪，無復羨慕，誠不自知其何也。」¹⁷⁰羅洪先在闢石蓮洞後多洞居靜修、逐漸減少參與講會，實與其學受聶豹的影響和自我體悟經驗有密切關係，他從 1543 年開始接觸聶豹主寂之論，¹⁷¹次年曾靜坐十日，恍恍見得，但因不夠確定，被王畿等人「一句轉了」。¹⁷²然而，隨著靜修的時日漸長、體悟漸深後，他對陽明學、尤其是王畿所倡的現成良知說，愈來愈不能相契。嘉靖二十九年(1550)時，羅洪先已明顯表達對陽明後學所傳良知論的懷疑，¹⁷³嘉靖三十四年(1555)更廢書塊坐三月，恍然大悟，從此確立己學。¹⁷⁴

雖然在這段漫長問學的期間內，羅洪先還是偶爾出遊講學，並不斷與其他陽明學者論辯，例如於 1548 年至青原會，又與王畿等人至虎山覓江浙會

¹⁶⁸ 羅大竑，〈玄潭重建眞君閣及脩羅文恭雪浪閣事疏〉，《紫原文集》，卷 8，頁 46a-48b。

¹⁶⁹ 見羅洪先與施閩章記，《吉水縣志》，卷 8，頁 32b-36a。亦見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 23，頁 10b。

¹⁷⁰ 羅洪先，〈夏遊記〉，《念菴文集》，卷 5，頁 19b。

¹⁷¹ 羅洪先，〈困辨錄序〉，《念菴文集》，卷 11，頁 1b。

¹⁷² 羅洪先，〈與尹道輿〉，《念菴文集》，卷 3，頁 34b。

¹⁷³ 錢穆先生指出羅洪先自此年後始多立說，且與王門流傳宗旨多未合。見錢穆，〈羅念菴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頁 188-212。

¹⁷⁴ 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 23，頁 1b。羅洪先，〈答蔣道林〉，《念菴文集》，卷 4，頁 1a-5a。

所：1554年與友人赴天池之會；1557年再至青原。然而，羅洪先不再像過去那樣熱衷講學，並且對當時如火如荼展開的講學活動有許多批評。一方面因為他身體多病、也因為對靜修以達收攝保聚之為學取徑日益自信，他認為東奔西馳的會講方式乃虛耗之功，雖仍主張不應以不聚會的激烈手段來矯講會之弊，但終究捨會講取靜修。¹⁷⁵另一方面，也因他不滿當時講學造成的弊病，他批評王畿等人的講學行徑引發許多政治糾紛：「往年韶州之行，物議騰滿，豹谷之黜，藉以指瑕。涇縣之聚，郡守持以短縣令，縣令幾致削迹。」羅洪先認為講學者應該避免託宿城市、儘量不勞官府、不犯人言，否則恐怕講學成了另一種賄賂公行、交際過情的方式。¹⁷⁶

羅洪先雖狀元出身，在士人當中享有極高的聲望和敬重，但一生出仕的年月卻僅寥寥數年，在前後三十餘年的講學生涯中，他除了不斷地與自己的病體和學問生命格鬥之外，也與其他陽明學領袖們共同興發帶動了嘉靖時期江右講學的最高潮，同時培養了許多後學。羅洪先的學友及門人，除上述諸學者外，至少尚有吉水縣的楊儲(1502-1578)¹⁷⁷、曾乾亨(1538-1594)、羅徵竹、王安器¹⁷⁸、王暹¹⁷⁹、劉子韶、陳坤載¹⁸⁰、羅灝¹⁸¹、泰和縣的歐陽乾元、

¹⁷⁵ 羅洪先，〈與劉仁山〉，〈寄雙江公〉，《念菴文集》，卷4，頁16a-18a；卷3，頁79b-81a。

¹⁷⁶ 羅洪先，〈答王龍谿〉，《念菴文集》，卷3，頁25b-28b。

¹⁷⁷ 楊儲，字元秀，別號毅齋，曾從鄒守益講學，有省，又與羅洪先講於石蓮洞，有深契。見胡直，〈雲南按察司憲副毅齋楊公墓誌銘〉，《衡廬續稿》，卷8，頁4b-10a。

¹⁷⁸ 王安器，字著久，號夢峰。年二十九，遊羅洪先門，聞立志作聖之說，恍然自失，因潛搜默識，不遺餘力，久乃有得，同門之士亦皆推讓，以為德性冠絕一時，羅洪先深器之。一生真修實踐不求聞達，羅洪先死後，其功愈密，鄉人見其徜徉山水，稱為真隱。著有《作聖語錄》等。見《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37，頁13a-b。

¹⁷⁹ 王暹，字養明，葛山人，是王安器的從弟。弱冠師羅洪先於石蓮洞，萬曆初以歲貢授涇縣教諭，遷韶州教授。擅駢體文，有歐蘇之長，著有《葛峰集》。見《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37，頁17b。

¹⁸⁰ 劉子韶與陳坤載以孝友著稱，其傳見《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39，頁11b-12a。

¹⁸¹ 羅灝為大學生，師羅洪先，亦從聶豹游。見聶豹，〈處士羅秋湖墓誌銘〉，《雙江聶先生文集》，卷6，頁40b-42a。

胡直、王託、歐陽昌(1516-1567)、曾于乾(1520-1562)、王一翕，¹⁸²茶陵的劉應峰，廬陵縣的劉孟雷¹⁸³、李祖述，安福縣的周采等。

羅洪先於 1564 年逝世，1560s 是那些親身跟隨過王陽明的江右學者們快速凋零的年代，歐陽德已於 1554 年去世，黃弘綱逝於 1561 年，鄒守益、陳九川逝於 1562 年，聶豹逝於 1563 年，當羅洪先於 1564 年去世後，帶出嘉靖時期江右陽明講會盛況的領袖們幾乎全數凋零，加上許多後起之秀也不幸早亡，此時陽明學必然面臨後繼無人的壓力。江右講學再次出現活力，必須等到 1570 年左右，當鄒德涵、王時槐、胡直、劉元卿等人再次倡會青原，而晚明吉水縣的講學領袖則是鄒元標。

鄒元標年輕時即接觸理學，從泰和縣的胡直遊，胡直是歐陽德、羅洪先的學生，將於下文介紹。鄒元標之所以成爲舉國聞名之直臣，主要跟他上疏爭張居正奪情獲罪有關，鄒元標是萬曆五年(1577)進士，同年九月張居正父親去世，政壇上因奪情事件已陷入政爭，吳中行、趙用賢等已受到杖刑除名、永不敘用、或充戍的刑罰，此時鄒元標以新科進士觀政刑部的身份接著上疏責張居正不歸葬之非，上疏後亦被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姑不論這項政治行動的是與非，鄒元標等人雖因此而折損了政治前途，卻也因此而「直聲震天下」，成爲朝野矚目、清望隆盛的人物。

張居正死後獲罪，鄒元標擢爲吏科給事中，不久即上書劾禮部尙書徐學謨和南京戶部尙書張士佩，又因慈寧宮災上陳時政六事而觸怒萬曆，被降爲南京刑部照磨，轉任南京兵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終於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移疾歸里。後雖奉召起刑部郎中，不赴，不久母親去世，遂罷官，家居講學三十年。直到光宗(r. 1620)朝起爲大理卿，天啓(r. 1621-1627)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與馮從吾(1556-1627)建首善書院講學，受到朱童蒙等人彈劾，鄒元標上疏辨明並求去，終於獲准歸鄉，1624 年卒於鄉，正是魏忠賢發動大規模對講學活動的政治壓迫的前夕。

¹⁸² 諸位泰和縣學者，見下文。

¹⁸³ 劉孟雷即劉教的長子，見胡直，〈梧州知府劉見川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 26，頁 5b。

鄒元標對於江右講學風氣的提昇和書院的興建有重要的貢獻，其中最鮮明可見的是促成仁文書院的修建。張居正死後，鄒元標上疏請復遭毀書院獲准，各地遂紛紛展開修復書院的工作。吉水本有文江書院，位於東郊義倉舊址，在張居正毀書院時遭到極大破壞，書院地被賣歸民間，此時也積極展開修復工作，在知縣徐學聚主事下完工，重建後的書院據描述是：「爲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並改名仁文書院，因爲書院位於仁峰和文水之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義。¹⁸⁴鄒元標致仕後，主要就在仁文書院聚徒講學。書院中之講會稱仁文會，有會簿和會約之設，著重悟、修、覺證的超悟真修之學，並希望透過此會革除宴遊徵逐之士習。¹⁸⁵

鄒元標以仁文書院爲主要講學地，但也在縣內的泮書東院、崇桂書院大開講堂，¹⁸⁶並遠赴復真書院、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依仁山館、文昌書院講學。¹⁸⁷他對於青原會的興復和會館的修建也有所注力。鄒元標對講學有一股經世的熱誠，他說：「吾邑如巨室，必須有人撐持，其所撐持，必須有人承當此學，此學豈易承當乎？」在這種「當發誓度人，更不向竹籬茅舍藏身」的使命感趨使下，他可以冒病在雪中趕百餘里的路，上文昌書院講學。¹⁸⁸他的講學果然帶出許多成果，從《吉水縣志》的儒林傳可見萬曆年間吉水縣中的名儒幾乎都出自鄒元標門下，包括李廷諫、李邦華(1574-1644)、曾天復、李宣、李賓、李榮、周日旦、謝始亨等人。¹⁸⁹從仁文書院的重修記載和鄒元標文集的編印署名可知其他門人尚有李日宣(1613 進士)、婁文華、張璋、藍光祚、徐弘祖、婁文蔚、李日東、曾子愉等人。¹⁹⁰然而整體而言，

¹⁸⁴ 鄒元標，〈仁文書院記〉，《鄒子願學集》，卷 5，頁 38a-40a。

¹⁸⁵ 見鄒元標，〈仁文會記簿序〉，〈仁文會約序〉，《鄒子願學集》，卷 4，頁 78a-b; 80a-81b。
王時槐，〈仁文會約後跋〉，《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 5，頁 33b-34b。

¹⁸⁶ 《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 22，頁 131, 14b-16a。

¹⁸⁷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頁 286-287。

¹⁸⁸ 鄒元標，〈答劉開卿吉卿茂才〉，《鄒子願學集》，卷 2，頁 40b-41a。

¹⁸⁹ 《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 36。

¹⁹⁰ 見崇禎十五年重修仁文書院時李日宣寫的記，於《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 22，頁 3a-6b。

此時講學的風潮已無法和嘉靖時期相比，鄒元標於 1605 年青原會時所作的詩篇，即表達了昔日風光不再的感嘆，以及呼籲同志齊心努力的殷望。¹⁹¹

而從其文集，我們則可看見鄒元標與當時各地講學者均有往來，並不拘泥學派之分。雖然鄒元標被列為東林黨人，與東林學者顧憲成(1550-1612)、高攀龍(1562-1626)有往來，而顧、高對陽明學又有直接嚴厲的批判，尤其對「無善無惡」之說絕然反對，但此並不意謂鄒元標在學術立場上與顧、高等人相近，事實上鄒元標頗能領悟「無善無惡」之旨，其學也深受佛學影響，黃宗羲論其學曰：「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為功夫，以不起意、空空為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¹⁹²因此鄒元標與東林派人物的關係，與其說是表達了學術思想的一致立場，毋寧說是政治立場的相近。¹⁹³

然而鄒元標畢竟處於明末陽明學弊端紛陳的時代，離王陽明謝世已將近一個世紀，雖然他的學承和交友都有陽明學的淵源，本身也致力於講學活動，但他也能擺脫王陽明學術權威的籠罩，對陽明學在明末的發展提出強烈的批評。他的〈重脩陽明先生祠記〉清楚表達了他的看法，他先說到自己受王陽明學術興發的經歷，早年他更喜愛薛瑄(1389-1464)的《讀書錄》，且學著做日錄，一直到被謫戍貴州時，才留心格物之學，從陽明學中體悟到「功夫即本體，本體即功夫，離本體而言功夫者是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而且在實際操持中有所領悟：「一旦有契於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遂躍如

¹⁹¹ 鄒元標，〈乙巳秋會青原有懷〉，《鄒子願學集》，卷 1，頁 30b-31a。

¹⁹²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23，頁 535。

¹⁹³ 溝口雄三反對過去以反「無善無惡」思想來理解東林派人士的思想，而嘗試以重視鄉村和宗族秩序等所謂「鄉村主導權」的立場來瞭解東林派立場，他也指出鄒元標、周汝登、楊起元、陶望齡等講「無善無惡」的學者，其實都是追求綱常世界的人物，並有與同時的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一同講學的情形。見溝口雄三著，林崇右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1992 年），第 3 章，頁 195-233。

曰：『先生蓋已上達天德，非膚儒所能窺測。』¹⁹⁴儘管他肯定王陽明之學乃經「兵戈搶攘，百折而証之」的聖人之學，¹⁹⁵陽明學也的確在「註疏訓詁牯我性靈，學者昧反身之學」的時代中像洪鐘般敲醒群寐。然而，陽明後學對「良知」紛紛擾擾的爭辯「流於詭與隨」、以及採取各種藉口而模糊黑白是非的講學風氣，則令他十分厭惡，¹⁹⁶他曾說：「吾鄉學問極能纏縛英豪，三尺豎兒口能談陽明，問其所以為陽明，白頭不知也。言及此，令人厭甚。」¹⁹⁷當「良知」成為到處流行的語彙時，鄒元標卻深刻感受到到王陽明學術精神之夷蕩與失落，他甚至不惜放棄陽明學的標幟與路徑，呼籲司世道者「宜易其塗轍以新學者心志。」¹⁹⁸因此，鄒元標所帶領的講學雖然在精神、形式、學者社群上都與陽明學派講學密切相關，但實際上已擺脫陽明學派的藩籬，在呼籲回歸更超卓的聖學理想中，與晚明其他批判陽明末學的聲音相呼應。

讓我們再看鄒元標講學的重鎮——仁文書院——在明清時期的命運，鄒元標於1624年去世，雖然留下不少熱心的門人，但次年緊接著而來魏忠賢毀書院的行動，仁文書院再度受到嚴重摧毀。在門人商議奔波之下，除了祀鄒元標的明德祠外，書院幾乎盡失，而此破敗的情形更維持了二十年，直到崇禎十五年(1642)才在知縣沈中柱和鄒元標門人婁文華、張瑋、李日東、曾子愉等人的努力下再度重建。沈中柱是浙江平湖人，劉宗周的學生，從事講學有年，此時任吉水知縣，並將劉宗周的《人譜》帶入此地講學中。清初施閩章因考慮舊址地處郊外相當荒蕪，又有虎豹出沒，呼籲放棄舊址，希望在城中仰止祠旁重建書院。但是，仁文書院雖然於康熙二年(1663)拆毀，卻一直未重修，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邑人才將之移建城內，祀鄒元標及弟子共

¹⁹⁴ 鄒元標，〈重脩陽明先生祠記〉，《鄒子願學集》，卷5，頁66b-70b。

¹⁹⁵ 「余鄉前輩多尊濂洛七閩為矩矱，近新建一倡，始知糟粕前聞，不知新建所謂知，蓋經兵戈搶攘，百折而証之，今之所謂知者，特其入門端倪，而所云良知猶屬有對封，有對封則落知識，落知識則有生滅，有生滅則不足以言室，去新建之旨亦何遠。」鄒元標，〈灑江書院記〉，《鄒子願學集》，卷5，頁62a-b。

¹⁹⁶ 鄒元標，〈重脩陽明先生祠記〉，《鄒子願學集》，卷5，頁66b-70b。

¹⁹⁷ 鄒元標，〈柬友人〉，《鄒子願學集》，卷2，頁4a。

¹⁹⁸ 鄒元標，〈重脩陽明先生祠記〉，《鄒子願學集》，卷5，頁69a。

一百零八人，乾隆八年(1743)知縣徐大修才重修，並增置院田。¹⁹⁹

綜合上論，從嘉靖到萬曆年間，吉水縣講學活動的最重要領導人分別是羅洪先和鄒元標，兩人以其直抗不屈的吉水土大夫氣質，²⁰⁰斷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卻也因此贏得鄉人的敬重；兩人也同樣以其對聖賢之學的渴慕，投身講學授徒的志業，先後開創了吉水講學的高峰。羅洪先生逢許多江右陽明弟子活躍的時代，他和鄒守益、劉邦采、聶豹等江右學者，以及多次造訪江右的王畿和錢德洪等人，共同鼓動了陽明講會的風潮。玄潭的雪浪閣和石蓮洞都是羅洪先關於 1540s 的講學場所，雖然羅洪先自從闢石蓮洞後，其個人的講學熱情漸退，更傾向於在洞內靜修，不過他的聲名和學識，卻使得石蓮洞成為許多學者造訪聚集的場所，人數之眾使得這個場所到 1560s 更必須擴建其規模，成為一所書院。

嘉靖時期的講學盛況經過張居正的禁毀行動，受到極大打壓，書院更是受損嚴重，鄒元標則是後張居正時代，吉水縣書院講學的重要興復者。張居正去世後，鄒元標即上疏請修復張居正所毀的眾書院，此亦促成各地書院和講學活動的復興。吉水縣的仁文書院於 1583 年重修完工，鄒元標於 1593 年致仕歸鄉講學，長達三十年的講學生涯使他成為吉水講學的核心人物，萬曆時期吉水縣的著名儒者幾乎都是其講友或門人。這波講學活動於 1625 年間再度受挫於魏忠賢的毀書院行動，此後書院雖仍有修復，但明朝滅亡在即、學術風氣易變，講學雖未全然沈寂，但已不復昔日風光。

而相當耐人尋味的是吉水縣講學與陽明學之間的關係，以羅洪先和鄒元標個人學術生命的轉折來看，兩人都從宋儒之學入手，再轉入陽明學的領域，深受其興發，其終生學友也多為陽明學者，然而兩人稍後卻又都強烈批評陽明講學的發展，質疑良知學的究竟，甚至倡議改弦易轍、放棄良知學。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陽明學普遍流行所造成學術上多元紛擾的聲音、以及伴隨著講學活動熱絡展開時的社交與士習，令學者不安，然而江右深厚的宋

¹⁹⁹ 《吉水縣志》（光緒元年刻本），卷 22，頁 1a-12b。

²⁰⁰ 羅洪先說：「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見〈東川先生行狀〉，《念菴文集》，卷 13，頁 18b-19a。

儒傳統以及豐厚的士大夫社群和文化傳統，也是讓他們可以更自由地出入陽明學的因素。

四、永豐

永豐縣的講學傳統悠久、學術淵源多重，從陽明學在此地的興起與發展，更容易看出陽明學實為宋以來理學傳承的一部分。明中葉以降，以直節著名的狀元羅倫(1431-1478)回鄉講學，不僅興起講學之風，羅倫的氣節風範也是永豐縣人最尊崇的典範。羅倫的朋友和弟子們，又紛紛與當時著名理學家陳獻章(1428-1500)講學，因此永豐縣在陽明學興起前實已相當程度地接受了白沙學的洗禮；直到嘉靖中期陽明學鼎盛時期，永豐縣的講學遂又匯入陽明學的思潮。而隨著陽明學派內部掀起的紛紛爭議，永豐縣的講學也呈現熱絡討論的內容。下文將以時代為主軸，介紹永豐縣講學的歷史。

羅倫是明代永豐縣最具典範風格的儒者，他十四歲即授徒於鄉，十五歲入郡庠，志聖賢之學。成化二年(1466)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當時內閣大學士李賢(1408-1466)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羅倫私勸無效，遂上扶植綱常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因此被謫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舉，羅倫雖因此事見逐，聲望卻也因此而日榮。隔年，奉召復翰林修撰職，改南京，然不久即引疾歸鄉，不復出。²⁰¹

羅倫為人剛正清廉，律己甚嚴，生活窮約，身後除御賜袍服外，別無所存，賴門人故友助以衣冠，始殮葬。羅倫致仕里居時間，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又倡行鄉約，曾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治喪不用浮屠法，鄉人多受其教化影響。²⁰²後來同邑友人張邦俊為之在金牛山上築金牛洞書院，建會秀堂，羅倫著書其中，而四方從學者眾，相與講學其中，所言皆身心性命之

²⁰¹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頁 2a-4a。陳獻章，〈羅倫傳〉，《陳白沙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4，頁 48a-50a。

²⁰² 同上註。

旨。²⁰³從《永豐縣志》可知，在陽明學興起前，永豐縣內的講學主要以羅倫為依歸，劉彥剛、羅孔哲、張邦俊、劉彬（1478 進士）、劉環、王守鼎等當地學者是其學友，羅奎（1474 舉人）、賴丕、羅養明、楊敷等為其門人。²⁰⁴而羅倫與當時聞名海內的陳獻章，雖未親交，卻彼此仰慕，陳獻章為羅倫撰寫傳記，對其推崇備至，稱其為才大志大的「豪傑之士」。兩人也互派門人向對方學習，²⁰⁵從此陳獻章的學術便深入永豐。

陳獻章是王陽明之前重要的理學家，也是當時海內聞名的講學者，從學術思想言，陳獻章之學已明顯脫離程朱學的典範，講究在靜中涵養心體，與陽明學的取徑有相當程度的契合，一般將其學問視為明代心學的開端，是介於明初朱學和陽明學興起間的重要學說。²⁰⁶陳獻章的弟子湛若水(1466-1560)更於弘治十八年(1504)與王陽明定交，以倡明聖學為共同的志向。²⁰⁷永豐縣在陽明學尚未進入時，已有不少陳獻章學術的追隨者，例如羅倫的學友劉彬，晚年與陳獻章講學碧玉樓中；羅倫的從叔父羅奎，曾受聘主講南雄的大中書院，也與張元楨、劉彬、陳獻章往來講學；羅倫的從弟羅養明曾聽從羅倫的指示從遊於陳獻章；羅倫的弟子楊敷，在羅倫去世後，又前往廣東受業於陳獻章。²⁰⁸永豐縣這股白沙學風對於稍後學者接受陽明學有相當的幫助，畢竟陳獻章與王陽明兩人的學問有相當類似的傾向，都是以回歸自己的心體為用功之把柄；而永豐浸染於向內靜修的白沙學，也應與聶豹稍後提出歸寂說²⁰⁹有某種學術氛圍的關連，聶豹晚年的確喜好白沙學術，並刻了《白沙緒

²⁰³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3，頁 24b。

²⁰⁴ 見《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 23。

²⁰⁵ 陳獻章使門人訪羅倫，見陳獻章，〈羅倫傳〉，《陳白沙集》，卷 4，頁 48a-50a；而羅倫的從弟、弟子們也多從陳獻章遊，見下文。

²⁰⁶ 關於陳獻章的思想及其學與陽明學的比較，見呂妙芬，《胡居仁與陳獻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第 2, 3 章。

²⁰⁷ 《王陽明年譜》弘治十八年下。於《王陽明全書》四，頁 82-83。

²⁰⁸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頁 16a-18b。

²⁰⁹ 簡言之，聶豹的歸寂說主張外事以求心，捨動以求靜，離已發以求未發，亦即直接從寂、靜、未發中體認良知，與王陽明所倡動靜合一、不分已發未發的主張相悖，故引起同門諸友疑難。

言》，自序言：「予嘗與士友譚學，言必稱白沙先生，並歌詠其詩以自娛。歎曰：『此周、程之墜緒也。』」。²¹⁰

嘉靖初年永豐縣的講學仍是承續羅倫和陳獻章的學脈，最重要的領袖是劉霖。劉霖，字中山，學者稱中山先生。劉霖的父親就是羅倫的學友劉彬，劉霖十二歲便隨父親官粵而得以面見陳獻章，他本欲拜陳獻章為師，父親因顧及他方學習舉業，勸其師同邑的楊敷。楊敷曾先後學於羅倫、陳獻章，故劉霖為羅、陳二先生的再傳弟子。不過劉霖終於還是放棄了科舉，專心理學，也一償宿願再度旅粵師陳獻章，數月而返。回鄉後，他「篤志聖學，嘗為崇正會與諸士講求古人所學何事及身心理欲之微。」²¹¹ 建構離明書院，優游於中；又因志行孚於鄉，能以片紙解決鄉黨間的爭執鬥氣之事，故聶豹稱其學「以靜虛為本體、以孝弟忠信為實地、以施貧活族正俗化鄉為實用。」²¹² 可見劉霖不僅承繼陳獻章講學的精神，也是地方上有聲望和影響力的領袖。

陽明學在永豐縣的流行始於 1530s 當鄒守益等人在青原山大開講會、傳講良知學時。劉霖的年紀較聶豹約長二十歲，²¹³ 因此在 1530s 劉霖已屆六十歲的高齡。對於這位在地方上享有學術道德聲望的長者，鄒守益等後輩自然力邀其共襄青原盛會，鄒守益在書信中便如此力邀其出席講會：「敝邑同志擬以九月舉九邑之會，念菴諸公皆許臨之，敢屈先生為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賴，秋氣日清，正東遊西泛時也，幸不靳命駕以對群望。」²¹⁴ 「八九月之交，敝邑圖舉大會，蓮坪、南屏、念菴皆許臨之，執事幸倡貴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專以請。」²¹⁴ 而劉霖對於這波鼎盛的陽明講學，也沒有排

²¹⁰ 聶豹，〈白沙先生緒言序〉，《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3，頁 11a-12a。關於聶豹的學術受陳獻章的啓發，以及其承受周敦頤、二程、李延平、朱熹等宋儒的學術之處，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論文，1995 年），頁 123-126。

²¹¹ 同上註，卷 22，頁 17b。

²¹² 同上註。

²¹³ 聶豹說其與劉霖之交曰：「先生擇友四方，四十以後而得予，予擇友，束髮而得先生。」見聶豹，〈祭中山劉先生文〉，《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7，頁 16a。

²¹⁴ 鄒守益，〈再簡中山〉，〈又簡中山〉，《東廓鄒先生文集》，卷 6，頁 24a-b。

拒，不但參與講學，稍後更「信餘姚良知之說」，使得永豐的白沙學風自然地與當時最盛行的陽明學融匯。²¹⁵

永豐學者中全心接受陽明學洗禮並積極傳播者，當首推聶豹。聶豹是正德十二年(1517)的進士，他與王陽明在嘉靖五年(1526)首次見面，當時聶豹已年屆不惑，且有近十年的宦官經驗。經過短暫的晤談，王陽明對他有非常好的評價，認為他天資甚厚、有志學古、勇於任道，可惜因公務不能久留，擔心他雖已信良知，但未能洞徹所得，恐難免為舊聞所障。²¹⁶聶豹在拜謁王陽明後，也致書向王陽明請教。然而二年之後，王陽明即病逝，當時聶豹任福建監察御史，曾重刻王陽明的《傳習錄》和《大學古本》。王陽明去世後第四年，即嘉靖十年(1531)，當時聶豹任蘇州太守，才正式設香案拜王陽明為師。²¹⁷

嘉靖十年十月，聶豹因父親去世歸鄉丁憂，此後一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冬再起赴平陽知府職，其間有十年之久，聶豹都居鄉過著授徒講學的日子。從前文我們知道，羅洪先於 1533 年回到吉水丁憂、鄒守益也於 1533 年回到安福，接著 1533 年首次舉會青原之後的各地講學活動，就是以這幾位講學領袖為核心，在各地分別興起的活動，同時也透過他們彼此密切而真誠的交往論學，²¹⁸使得陽明講會的規模更擴大為整個江右的盛事。根據永豐後學宋儀望(1514-1578)所記，此時聶豹家居，「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實功夫。」²¹⁹關於此，聶豹曾在書信中與王陽明討論過，王陽明對於他這個工夫取徑雖然也嘉許為篤實，然終擔心其無法認識到良知

²¹⁵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頁 17b。

²¹⁶ 參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117。

²¹⁷ 聶豹生平紀事，見林月惠，〈良知學的轉折——聶雙江與羅念菴思想之研究〉，頁 367-394。

²¹⁸ 宋儀望所撰寫的聶豹行狀：「先生自聞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學，其同輩如同郡東廓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德、念菴羅公洪先、兩峰獅泉兩劉君文敏邦采、臨川明水陳君九川、虔州洛村黃君宏綱、餘姚緒山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辯究。」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 年），卷 11，頁 14a-b。

²¹⁹ 同上註，卷 11，頁 14b。

發見流行、當下具足之義。²²⁰從後來聶豹學問發展看來，王陽明的擔心確實有道理，在聶豹提出歸寂說之後與其他陽明弟子的辯論，其主要關鍵仍是聶豹無法深契王陽明所提出的這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的良知意義。²²¹

聶豹在 1541 年底赴任平陽知府後，多有建樹，又與當地舉人和州縣學生講學，著有《大學古本臆說》。兩年後(1543)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同年聶豹上疏乞休南歸，其間有許勉仁謗毀導致上令山西撫按官查勘之事，在三、四年的查勘行動中，聶豹均在鄉從事講學，此時論學已以涵養本體虛寂為依歸。²²²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言(1482-1548)因聽信謗者言，逮捕聶豹入錦衣獄，聶豹在被捕過程中顯出的從容與寬容，令許多人印象深刻，²²³這段冤獄終於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結束。在獄中一年多的時間是聶豹確立己學極重要的關鍵，黃宗羲說：「先生之學，獄中間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此因著長期靜修而心體朗現的悟的經驗，與聶豹長期以來問學的傾向緊密相關，也從此確立了聶豹歸寂說的立場，更引發同門的質疑。²²⁴

嘉靖二十九年(1550)聶豹再度被召為僉都御史，尚未赴，擢兵部右侍郎，不久轉左侍郎，嘉靖三十二年(1553)陞兵部尚書。嘉靖三十四年(1555)聶豹因上疏反對趙文華(d. 1557)所議遣視師、祀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

²²⁰ 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270。

²²¹ 同上註。

²²² 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卷11，頁8b-9b, 15a。

²²³ 聶豹的行狀：「往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同郡東廓、念菴諸公皆追送江潞，猶相與講學不輟。」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卷11，頁15b-16a。黃宗羲：「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明儒學案》，卷17，頁371-372。

²²⁴ 聶豹提出歸寂說後，同門的王畿、黃弘綱、陳九川、鄒守益、劉文敏各致難端，聶豹一一答辯，惟羅洪先深契之，劉文敏晚亦信之。見《明儒學案》，卷17，頁372-373。

事，²²⁵而忤旨罷歸。其姪聶靜（1535 進士）亦以此時落職，遂隨侍南歸。聶豹返鄉後，建賜老堂於東皋上，日與故人門生子弟講究學術，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逝世為止。

從上述聶豹生平我們得知，聶豹從 1531 年回鄉丁憂至 1563 年去世的三十餘年間，大約僅七年的時間出仕在外，一年多的時間在獄中，其餘二十餘年的歲月均居鄉講學。而且這二十餘年講學的歲月又恰巧也是鄒守益、羅洪先居家的時日，這些著名的陽明弟子們不期然地同遭仕途困頓的命運，竟然成為江右陽明講學的最重要契機。嘉靖中期是陽明講學的黃金年代，在永豐縣中也開始出現一批浸潤於陽明講學的士人。

曾夢祺（即鄒夢祺，1492-1556）²²⁶為諸生時即因王陽明弟子冀元亨過永豐而有機會聽到良知之學，時約在 1521 年左右，不過他正式參與永豐的陽明講會則在 1543 年之後，此時曾夢祺已有八年的仕宦經驗，並已致仕返鄉。曾夢祺歸鄉後，構龍岡書院，居暇主要以講學、訓飭子弟、化道鄉人為務，更積極參與講會：「每四方同志大會於青原玄潭之間，與劉晴川、鄒東廓、羅念菴三數君子迭相為主，雖隆冬盛暑，猶披襟夜談，聲聲不倦。」²²⁷

邱一鴻一生為布衣，少嗜學不倦，後因疾廢博士業，篤意養生之術，病癒後，厭棄世事，意布衣疏食終身，自號石澗居士。因聽說鄒守益、羅洪先等講學青原山，遂往相從講學，益自奮勵，並將所學告之鄉人，鄉人感服。邱一鴻也曾與宋儀望交游，並遣兒子學於宋儀望。²²⁸鍾微，閩田人，幼孤、

²²⁵ 差田賦指蘇松四府民田一丁過百畝者重科其賦，更預徵官田之稅三年以佐軍興；遣視師言當事諸臣以兵為試，須以重臣監督之乃克成功。趙文華所陳七事，見《明世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校刊，1966年），卷419，頁7269-7270。

²²⁶ 即《永豐縣志》中的鄒夢祺，是靖難忠臣鄒瑾的後裔，因夢祺世祖季式出繼營前之曾氏，遂以曾為姓，至夢祺之子為諫議，疏其事，始復鄒氏。見聶豹，〈奉直大夫龍井曾公墓誌銘〉，《雙江先生文集》，卷6，頁42b-46a；郭汝霖，〈諫議鄒君傳〉，《石泉山房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11，頁2a-3b。

²²⁷ 聶豹，〈奉直大夫龍井曾公墓誌銘〉，《雙江聶先生文集》，卷6，頁44b。宋儀望，〈龍井曾刺史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卷11，頁37b-41a。

²²⁸ 宋儀望，〈處士邱一鴻傳〉，《華陽館文集》，卷9，頁9a-10a。

事母孝，聞鄒守益得餘姚宗派，遊其門，默有契悟，爲一時名流所推許。²²⁹謝蒙選嘗與聶豹、劉霖、劉濬輩講學，當時顯然陽明學與甘泉學同樣流行於永豐縣。講陽明學者主致良知，講甘泉學者主隨處體認天理，謝蒙選則嘗試統合二學說，以爲良知之致即體認工夫，體認天理即致知之學。²³⁰另外，宋儀望爲聶豹撰寫的行狀指出，聶豹講學永豐，邑里學者與之交游往來者，除了上述諸人外，尚有湯克寬、陳唐甫、劉希昭、蕭韶、鍾紐、陳綸等人。²³¹這些人乃與聶豹同輩的學友，並非陽明弟子，因忻慕陽明學與鄒、羅、聶等人的名聲而參與講會，由此可以想見當年陽明學在江右興起時，有力吸納當地學者的情形。

另外，尚有一批年輕的陽明學新力軍：謝經，弱冠爲諸生，從聶豹和羅洪先遊，學益進，「屢走青原、武山、蓮洞，就諸儒講學。」其論學曰：「人心本虛靈，體用具足，吾輩但息慮凝幾，洞見本性，乃能通乎晝夜而知陰陽之故。」可見其學與聶豹、羅洪先相近。²³²同樣在二十餘歲爲諸生時即立志學古人之行的謝維世，也從聶豹、羅洪先遊，益加嗜學，後又與宋儀望往來，並躬率弟子講學。²³³聶有善是聶豹同里人，因聞聶豹主靜宗旨，命圻者圖其像、上書太極圖說，懸之靜室，終日端坐省身。²³⁴宋儀望指出，聶豹的弟子除了永豐縣內三位進士、四位舉人外，²³⁵「凡諸胄監企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百餘人，皆從先生游。」至於海內各地的門徒之數，則不下數百人，可見其學術影響力。²³⁶

²²⁹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3，頁 27b。

²³⁰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頁 20a。

²³¹ 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卷 11，頁 17a。

²³² 謝經傳見《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2，頁 19b-20a。

²³³ 宋儀望，〈謝孝子廬墓記〉，《華陽館文集》，卷 5，頁 19a-21a。

²³⁴ 《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3，頁 28b。

²³⁵ 三位進士分別是宋儀望、郭汝霖、鄒濂，下文將敘及。四位舉人爲：宋龍、蕭浩、張鏗、袁禮。見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卷 11，頁 17a。

²³⁶ 同上註。

逐漸地，永豐縣先前流行的白沙學也為陽明學所取代，劉濬、劉溢、劉沆、劉沈等劉霖家族中的子弟們（劉霖之姪），²³⁷都先聞陳獻章之學，劉濬更曾親遊湛若水之門，但在青原等講會興起後，則紛紛加入陽明講學的陣營，甚至正式投入鄒守益、聶豹等人的門下。劉溢因宗良知之學，懸掛王陽明的像於家中祀之；劉沈兄弟往來青原與復古等會，劉沈晚年則響應陽明學者郭汝霖(1510-1580)之倡，建太極書院，率人講學作會其間。²³⁸

本來永豐縣接棒的陽明講學者或許能有更出色的成績，但不幸地，許多年輕學者過早凋零。從縣志看來，受陽明講學薰陶最深的新一代接棒人應該是嘉靖九年(1530)同被選為邑諸生的幾位年輕學者，即宋儀望、郭汝霖、鄒濂、羅靖。²³⁹宋、郭、羅、鄒四位諸生非常積極地參與聶豹、鄒守益等舉辦的講會，受陽明良知學的啓迪頗深。傳稱羅靖為人忠信篤行，頗獲聶豹稱許信任，可惜屢次科舉不第，竟於嘉靖十九年(1540)墜舟溺斃。²⁴⁰鄒濂即曾(鄒)夢祺的兒子，會試下第後與宋儀望讀書山中，自號六華山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與郭汝霖同登進士。中舉後，先任行人，後選禮科給事中。傳稱其早年豪宕，但中歲講學聶豹、歐陽德之門，不喜空談馳逐，志敦實行，忠信孝友，頗有聲望。然而就在其仕宦生涯要再上層樓、被擢陞為浙江參議之際，卻暴病而亡。²⁴¹像鄒濂和羅靖這樣已進入或極有機會進入官僚體制的新一代講學者的過早凋零，對於永豐縣講學的發展必然有重大影響，最終此地以仕

²³⁷ 諸位傳記，分別參見《永豐縣志》（同治 13 年刻本），卷 23，頁 28a-b。宋儀望，〈明處士劉君夫婦合葬墓誌銘〉，《華陽館文集》，卷 7，頁 16a-18a；郭汝霖，〈處士羅州劉君墓誌銘〉，《石泉山房文集》，卷 13，頁 2b-4a。《永豐縣志》言劉溢「與弟沈同遊吉水羅文恭之門」，但根據宋儀望為劉沈所撰墓誌，劉沈之兄名為沆，劉溢與劉沈可能是堂兄弟。

²³⁸ 同上註。關於郭汝霖，見下。

²³⁹ 本來尚有陳多周亦在諸生之選，不幸於次年夭死。見宋儀望，〈明故浙江布政司左參議鄒君墓誌銘〉，《華陽館文集》，卷 6，頁 1a-4b。

²⁴⁰ 郭汝霖，〈處士良山羅君偕配湯孺人合葬墓表〉，《石泉山房文集》，卷 13，頁 1a-2b；去世之年見上註。

²⁴¹ 郭汝霖，〈諫議鄒君傳〉，《石泉山文集》，卷 11，頁 2a-3b；宋儀望，〈明故浙江布政司左參議鄒君墓誌銘〉，《華陽館文集》，卷 7，頁 1a-4b。

宦顯名的陽明學者僅有宋儀望和郭汝霖兩人。

宋儀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進士，一生仕途並不順遂，前後與嚴嵩(1480-1569)黨人和張居正不合，屢起屢躓，歷任吳縣知縣、大理寺丞、四川僉事、副使、福建學政、參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等職。²⁴²由於其宦遊在外時日多，居鄉時日少，因此對於永豐縣內的講學提倡之功較不顯著。不過在其仕宦之地，則相當熱切地宣傳陽明學。當其令吳時，創子游祠，築書院，與諸生講業其中；為福建學政時，熱心提倡陽明學。福建是朱熹的故鄉，一向尊朱學，陽明學在此地極難打開局面，但宋儀望以教育官員的權勢來提倡，自然有相當果效。根據葉向高(1559-1627)所言，諸生中有能為良知言者，宋儀望皆置高等，因此福建諸生中以朱學訓詁支離為非而信服陽明學的人增加了。²⁴³

宋儀望熱衷講會活動，早年師同鄉聶豹，參與鄒守益等倡辦的盛大講會。成進士後，又逢歐陽德在南京倡會，講辯氣氛熱烈，常至日昃不暇休，宋儀望趕上此熱潮，並深受其激發。後來因京師同志去來無常，講會漸漸衰微。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宋儀望和呂光洵(1518-1580)以此會散落為念，重新發起，遂與何遷(1501-1574)、羅汝芳、胡直、鄒善等人復訂前會，與會者「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甚至達百人之多。²⁴⁴除此大會外，宋儀望又與胡直、鄒善等十餘人，於水塘菴舉行小會，再度振興京師講學的風氣。²⁴⁵

宋儀望的〈陽明先生從祀或問〉是一篇重要文獻，此文主要是因為王陽明陪祀孔廟的事，引發許多爭論，²⁴⁶宋儀望說：「同志中因究論陽明之學與

²⁴² 葉向高，〈大廷尉華陽宋先生傳〉，《蒼霞續草》（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卷15，頁21a-24a。

²⁴³ 葉向高，〈大廷尉華陽宋先生傳〉，《蒼霞續草》，卷15，頁21a-24a。

²⁴⁴ 見宋儀望，〈贈大理石少卿呂公遷南光祿卿序〉，《華陽館文集》，卷2，頁1a-2b。於〈奉賀胡母太夫人八十壽〉中記與胡直等人講學時，則言：「於是士大夫翕然從之，每會至百數人。」同上，卷4，頁14a。

²⁴⁵ 同上註。

²⁴⁶ 參考朱鴻林，〈陽明從祀典禮的爭議和挫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期5（1996

宋儒所以異同之故，言人人殊，僕乃作為或問，反覆辯難，以極折衷之旨。」²⁴⁷可見此文原是宋儀望與同志們針對王陽明之學術與事功在從祀爭議中引發的爭議，互相討論的結果，起初並沒有刊刻。萬曆元年(1573)，當另一波上疏請祀王陽明開始之際，宋儀望本擬上疏，但當時趙思誠(1565進士)、石檀嚴詞批評王陽明，指斥陽明學為偽學，同志力勸宋儀望不要上疏，後來宋儀望才將此文付梓，在同志學友之間流傳。²⁴⁸雖然這不是一篇正式上疏的文章，但因對王陽明事功及其學術內涵與定位剖析精詳，向來被認為對後來王陽明獲祀孔廟有幫助，四庫閣臣謂：「其〈從祀或問〉亦即為守仁配享事作，故史稱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²⁴⁹至於〈陽明先生從祀或問〉的內容，主要闡明王陽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如何上承孔門傳心之要、千古聖人不傳之秘，扭正程朱後學析心與理為二之弊。朱鴻林之文已有細論，在此不再贅述。

宋儀望於萬曆五年(1577)十二月由大理寺卿外調南京，被劾歸鄉，萬曆六年(1578)去世。晚年在鄉的短暫歲月，正逢他年少以來的學友郭汝霖也致仕家居，兩人仍共同講學、互相議論。²⁵⁰郭汝霖與宋儀望兩人是姻親，又同補邑諸生，早年即共同參加講學，同師鄒守益、歐陽德、聶豹。郭汝霖四十四歲(1553)成進士，歷任吏科給事中、刑科右給事中、左給事中、光祿寺少卿、順天府丞、大理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等職，並曾奉命出使琉球。任大理少卿時，閒暇時則集同志士講學靈濟宮。²⁵¹

隆慶元年(1567)，郭汝霖致仕返鄉，至萬曆八年(1580)去世止，有十餘

年)，頁 167-181。

²⁴⁷ 宋儀望，〈陽明先生從祀或問〉序，《華陽館文集續刻》，卷 1，頁 1a-b。

²⁴⁸ 同上註。關於此時陽明從祀所引發的爭議，請見朱鴻林，〈陽明從祀典禮的爭議和挫折〉。

²⁴⁹ 見《華陽館文集》卷末，頁 495。

²⁵⁰ 今《石泉山房文集》卷 6 中可見幾封郭汝霖回覆宋儀望的書信，顯示兩人學問之途徑並不相同，大體郭汝霖主張孔顏聖學乃無內無外、當下即了、天然一貫、徹上徹下之學，陽明之學亦然，而認為宋儀望未能悟此，將形氣與性命、已發和未發截為相對之二。

²⁵¹ 胡直，〈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一厓郭公墓誌銘〉，《衡廬續稿》，卷 8，頁 14a-b。

年居鄉的歲月，再度投身講學的活動。²⁵²隆慶初年正逢青原山講會再度在鄒德涵、王時槐、胡直等人帶動下復興，郭汝霖每歲至青原會，顯然也是這波講會復興的功臣之一。²⁵³王時槐對於此時兩人交往問學有記曰：「已而先生與予相繼解組南歸，予寓榻金牛禪院，先生時一至郡，必信宿金牛，叩予靜中所詣，商訂可否，又時時共對於青原西原，顯證密參，加勤弗懈。蓋先生以予資雖闇鈍而志知嚮往，乃於予契合最深，予乃蒙指導督勸之益，於先生者厚矣。」²⁵⁴郭汝霖比王時槐年長十二歲，故王時槐以長者尊之，兩人仕宦京師時已共同講學，²⁵⁵致仕後又往來密切，在青原、西原講會中時有切磋。

郭汝霖除了參與江右的盛會，與其他縣的學者交往問學外，對永豐縣內的講學活動也有貢獻，他所倡建的太極書院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落成，主要因郭汝霖有感於鄉無講學之所，地方人心風俗無由教化，因此謀於鄉之豪傑欲興書院，²⁵⁶此事在鄉人劉沈、吳思成、李直卿等的積極謀劃下，終於完成。²⁵⁷書院的規模是：中間有義聚堂，兩旁翼以廊道，前有覽秀樓三間，後建景止祠，祀鄉賢，書院主祀鄉賢羅倫。興建書院之費用由鄉人捐獻，吳思成出田為祀祭和講會之需。²⁵⁸此書院主要做為鄉人講學作會的場所，這類聚會乃屬於鄉約教化性質的地方講會。²⁵⁹郭汝霖又與同邑士人共舉敦復之會，於螺獅庵中講學，此應有別於前者，屬於士人之間較小型的講會，可惜找不到其他進一步的資料說明。²⁶⁰

²⁵² 關於郭汝霖生平大事與其《重編使琉球錄》，見夫馬進，〈郭汝霖撰《重編使琉球錄》〉，《使琉球錄解題および研究》（沖繩：榕樹書林，1999年），頁19-32。

²⁵³ 胡直，〈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一厓郭公墓誌銘〉，《衡廬續稿》，卷8，頁11a-12a。

²⁵⁴ 王時槐，〈石泉山房文集序〉，於《石泉山房文集》卷首。

²⁵⁵ 同上註。

²⁵⁶ 郭汝霖自述：「余歸自京師與二三君子會，未嘗不慨然，僉曰：士首四民而移風俗也，乃今去邑庠遠，麗澤無所，何以激作維持之，遂謀於鄉之豪傑，鳩材度工，而書院興矣。」見〈太極書院碑〉，《石泉山房文集》，卷10，頁2a。

²⁵⁷ 《永豐縣志》（同治13年刻本），卷23，頁28a-b。

²⁵⁸ 郭汝霖，〈太極書院碑〉，《石泉山房文集》，卷10，頁3a。

²⁵⁹ 《永豐縣志》（同治13年刻本），卷21，頁18a；卷23，頁28b。

²⁶⁰ 《永豐縣志》（同治13年刻本），卷21，頁18a。

另外，永豐人梁汝元（後改名何心隱，1517-1579）率同族建聚和堂以教導鄉族子弟一事也值得一提。梁汝元，字夫山，瑤田梁坊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成諸生，大約就在此時遇見顏鈞(1504-1596)，得聞王艮(1483-1541)之學，深受啓迪，遂以身任道。七年後(1553)更率同族建聚和堂、創義田、儲公廩，希望藉著教育、稅收和其他互助方法，落實教化和諧族人的目標。梁汝元的理想，一方面呼應著當時愈來愈普遍的宗族整合的傾勢，²⁶¹一方面也有其屬於泰州學派和其個人俠骨風格的特殊性，²⁶²其學雖受陽明弟子王艮之影響甚深，逃亡期間也經常聚徒講學，與羅汝芳、耿定向等陽明學者均有論學，但是在永豐的梁汝元卻未與同郡之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名儒密切往來，亦未見其參與江右本地講學。嘉靖四十年(1561)梁汝元改名何心隱逃離永豐，歷遊大江南北，終未能再回到永豐，聚和堂所規劃的「均」、「和」願景也因此而破滅。關於梁汝元之生平與思想，學者已有詳細研究，又因為其在永豐的建樹主要為聚和堂，與其他本地陽明學者較無交涉，故本文不擬討論。

綜上所論，陽明學在永豐縣的流行與整個江右陽明學的發展相呼應，其在嘉靖年間的興盛主要是聶豹居鄉其間，與安福的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等人共同倡會講學的成果，不過先前此地羅倫的講學和陳獻章的學術影響，也是陽明學可以快速興起的助因之一。1560s 當鄒、聶、羅等著名陽明學者凋謝之後，永豐縣雖有如謝經、謝維世、劉溢等布衣處士，繼續執守篤志修道的學風，然從聚眾作會的活動面看來，則並不熱絡。以仕宦身份來提倡講學的學者而言，新一代的學者僅宋儀望、郭汝霖二人，宋儀望卻因居鄉日短，對本地講學的影響並不彰顯；郭汝霖的倡導之功則可見於敦復會和太極書院的興建，可惜無法評估這些講會和鄉會的發展和影響。到了萬曆年間，此地陽

²⁶¹ Joh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pp. 125-134。

²⁶² 關於何心隱的研究，見 Ronald G. Dimberg, *The Sage and Society: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o Hsin-yin*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 Yu-Yin Cheng, "The Ethics of the Sphere Below (Hsi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o Hsin-yin (1517-1579)," 《漢學研究》，11.1（1993年），頁 49-102。

明學即明顯呈現後繼乏人的情形。

五、泰和

泰和縣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陽明學者是歐陽德，歐陽德的仕宦生涯頗平穩，他並不像鄒守益、羅洪先、聶豹等人因仕途困挫而居鄉講學的時日長達二、三十年，也因此他對於泰和的講學活動，雖不可謂沒有影響，卻明顯受限。以實際師承啓發與主盟講會而言，歐陽德實在無法與鄒守益、羅洪先、聶豹三人之於其本鄉的影響，相提並論。倒是他長期在南京爲官，對官僚階層與南中地區的講學有極大興發之功。²⁶³因此，泰和縣雖有不少王陽明的及身弟子，但縣內直到 1540s 仍然沒有組成陽明講會。第二代陽明弟子中，固然許多人拜在歐陽德門下，但他們同時也師承鄒守益、羅洪先、劉陽等長年居住江右的學者。²⁶⁴在泰和第二代陽明弟子中，以胡直最著名，胡直與學友們輾轉求師、組會講學的困學經歷，標幟著嘉靖、隆慶年間陽明學在此地繼續發展的精神，而其晚年主講的求仁書社，則是鄉里支持講學的例子。進入晚明，泰和縣的講學活動似乎完全沈寂，顯然第三代弟子不能在科舉上爭功名、或在地方事務上立功績，因此無法留下歷史記錄。下文將按著時序，討論陽明講學在泰和縣傳承演變的情形。

正德年間王陽明在南贛的講學吸引不少泰和縣學者的參與，其中著名者有：王思(1481-1524)，他是王直(1379-1462)的曾孫，正德六年(1511)的進士，因上疏獲罪，被謫潮州三河驛丞。王陽明討宸濠時，檄王思贊軍議，世宗嗣位，王思得復故官，但不幸卻在大禮議之爭時，被下詔獄，因杖成傷而卒。²⁶⁵劉魁(約 1489-1552)是正德二年(1507)舉人，王陽明講學虔臺時，他與歐陽德等人從之受業，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官至工部員外郎，嘉靖

²⁶³ 參見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卷 12 期 1，頁 53-112。

²⁶⁴ 師鄒守益和羅洪先者，見下文。師劉陽者有鍾燭，鍾燭回鄉後建求仁精舍，延師友居之。見胡直，〈胡母劉孺人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 26，頁 7b-9a。

²⁶⁵ 王思之傳記，見《泰和縣志》(同治 11 年修本)，卷 17，頁 21b-23a。

二十一年(1542)因上疏諫止徙雷壇於禁中，而下詔獄。在獄中，日與楊爵(1493-1549)、周怡(1506-1569)講學相淬礪，²⁶⁶嘉靖二十六年(1547)才獲釋，但不久即亡。²⁶⁷李鑿是王陽明聘請主教虔臺的學者，其子李滄與兄李絳，也都受學於王陽明。

此時接觸陽明學的泰和學者中，日後以歐陽德最著名。歐陽德出身泰和望族，家族中共產生了 125 位官僚，其中有 14 名進士。²⁶⁸歐陽德天資早慧，九歲以奇童著稱，十三歲為弟子員，二十一歲便取得舉人資格。他因慕王陽明之名而至虔臺從學，又因一心嚮學，竟二度不赴會試，直到嘉靖二年(1523)才應試，並順利成進士。他的仕宦生涯頗平順，從六安知州、刑部外員、翰林院編修、南京國子司業等職，官至禮部尚書。其中大約有十五年時間在南京為官，並職掌教育的官職，積極宣揚陽明學理念、提倡講學活動，對後輩學者的影響極大。²⁶⁹在出任禮部尚書居京師時期，又於 1553-1554 年間，與徐階、聶豹、程文德共同主盟靈濟宮的講會，學徒雲集，黃宗羲說：「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²⁷⁰

其他屬於王陽明及身弟子的泰和縣學者，尚有胡堯時(1499-1588)，他是嘉靖五年(1526)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在貴州修建陽明書院、刊行王陽明的著作，對陽明學於貴州的傳播有重大貢獻；²⁷¹曾忬(1498-1568)也是嘉靖五年的進士，當王陽明在浙江講學的時候(1521-1527)，曾忬出任光澤知縣，遂前往受業，從此不僅在宦地提倡講學，晚年與郡邑同志集講青原、白鶴、雲津，並與郭應奎等共創聚〔萃〕和書院；²⁷²王貞善則是受業於王陽明之後，

²⁶⁶ 楊爵和周怡分別於嘉靖二十年、二十二年因言事入獄。其傳見《明史》，卷 209，頁 5523-5527，5528-5530。

²⁶⁷ 劉魁傳，見《明史》，卷 209，頁 5530-5531。

²⁶⁸ Joh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169.

²⁶⁹ 歐陽德生平，見聶豹，〈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6，頁 12a。

²⁷⁰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17，頁 360。

²⁷¹ 《泰和縣志》（同治 11 年修、光緒 4 年刻本），卷 17，頁 25b。

²⁷² 見宋儀望，〈明故兵科都給事中前川曾公行傳〉，《華陽館文集》，卷 11，頁 29a-37b。雲津，指雲津書院，在縣治南龍洲上；郭應奎，字致祥，是湛若水的學生，倡建萃和書

又學習湛若水之學，他在嘉靖七年(1528)成舉人，授揭陽縣知縣，卻因忤上官，不滿歲而歸，居鄉時與兒子王一俞、王一視同講學鄒守益和羅洪先之門。²⁷³據胡直所言，王貞善為人凜若嚴師，性不喜辭華，曾著有〈靜談〉、〈法言〉、〈勢論〉等篇章，後題為《王氏內外篇》。²⁷⁴

從上述這些陽明第一代弟子的生平事蹟，我們可以發現王陽明在南贛的講學雖然贏得不少泰和縣年輕菁英學者加入其陣營，但是這些菁英學者或因政治抗爭而英年早逝，或因長期仕宦生涯而遠居外地，或因學識不足以號召承擔一獨立講會的成立，總之，泰和縣的確沒有產生一位像鄒守益之於安福、羅洪先之於吉水、聶豹之於永豐，能夠在本縣內大力倡導講學的學者。因此在嘉靖初期，泰和縣並未能形成自己的講學中心，主要是參與青原山、石蓮洞的講學活動。這樣情形到了 1540s 稍有變化。

歐陽德於 1542 年因奔喪回鄉，並一直待到 1546 年才再度出仕，此段時日內他不僅與聶豹、鄒守益、羅洪先等人「周旋于青原梅陂之上，相與求未發之真知，究先師之遺旨；」²⁷⁵也興發了不少本地的年輕學者。根據胡直的追憶，1542 年歐陽德「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²⁷⁶可見官位與聲名的確是號召講學的重要因素，也就是這個機緣，許多年輕一輩的泰和學者走進了陽明學的領域。

當時胡直二十六歲，起先並沒有隨同傾城士子們去拜訪這位著名的前輩學者，可能因為他對於理學本沒有太大興趣，也不太想跟隨流俗。²⁷⁷胡直自

院於縣儒學右書社舊址，為泰和士子講學重鎮。見《泰和縣志》，卷 8，頁 1a-3b, 8a-9a；卷 17，頁 24b。

²⁷³ 《泰和縣志》（同治 11 年修、光緒 4 年刻本），卷 17，頁 26a。

²⁷⁴ 胡直，〈王氏內外篇序〉，《衡廬精舍藏稿》，卷 8，頁 64a-66a。

²⁷⁵ 聶豹，〈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南野歐陽公墓誌銘〉，《雙江聶先生文集》，卷 6，頁 12a。

²⁷⁶ 胡直，〈困學記〉，於《明儒學案》，卷 22，頁 519-526。

²⁷⁷ 講學雖然標榜學聖人之學，但是在當時的確摻雜著許多政治利益的考量，許多年輕生員熱切地投入，絕不都是為了學做聖人，尤其以官員身份提倡講學更是如此，這一點講學領袖是心知肚明的，歐陽德談到京師講學情形曾說：「此中諸生雖日進講，終是勢利場中，填實切磋者寡。」地方上講學情形或許稍好，但應亦不能免俗。歐陽德，〈答鄒東

述其年少以來喜詞章之學，羨慕孔融、李白、蘇軾等之為人，並曾著書駁王陽明之說，後雖覺非而欲自奮為學，但終不得要領而仍取舊習。後來在好友歐陽昌的力邀下，胡直終於前往普覺寺拜訪歐陽德，沒想到歐陽德一見他輒親切呼其舊字——宜舉，他又因見歐陽德態度誠懇、不擺官架子，便頗心服。緊接著聽取歐陽德闡明「惟仁者能好人」一章時，更覺字字為其所發，深受感染。事後再度拜訪請益，歐陽德以立志勉之，胡直終於豁然有契，便歸入歐陽德門下。²⁷⁸

然而胡直學道的路途並沒有因為歐陽德的啟發而一帆風順，其〈困學記〉詳盡記載了他漫長迂曲的為學歷程。胡直從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舉之後，要一直考到三十五年(1556)才成進士，這段辛苦而挫折的科舉之路，也同時是他學問與生命意向擺盪不定、輾轉求師未決的歷程。胡直在二十六歲(1542)立志學聖之後，仍時時擺盪於詞章舊習與學聖之間，又因科考的挫折，內心多忿慾，致屢興屢仆、不能專志。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但因好友王託鼓勵「遐舉不如力學」，兩人遂偕往吉水拜訪羅洪先，居石蓮洞一個多月，親受羅洪先的教誨興發。此時羅洪先教之以「專在主靜無欲」，胡直雖不甚相契，但日日操持，於精神日履之嚴謹亦有助益。

胡直於次年(1548)遊韶，拜陳大倫學玄、與鄧魯問禪，在長期打坐修心的操練之後，也經歷了心思開悟、洞見心體、宿疾全癒、能感異夢等奇妙的經驗。之後因起念，遂失初悟，一日又忽得悟，遂印證先賢語言，無不合旨，在此一失一得之後，胡直遂更能立志不能世網所累。隔年(1549)回鄉之後，便與邑中諸友共組一會講學，此會應該就是他在〈亡友月塘曾君墓誌銘〉中所說的「五人會」，²⁷⁹與胡直共同組會講學的學者則有曾于乾、王託、歐陽昌、羅潮、蕭隆佑。這些人也就是泰和縣第二代陽明學的主力，不過除了胡直以外，其餘都未能取得進士功名，由於無法找到羅潮和蕭隆佑的傳，底下先分別介紹另外三位學者。

廓〉，《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卷2，頁3a。

²⁷⁸ 胡直，〈困學記〉，於《明儒學案》，卷22，頁519-526。

²⁷⁹ 胡直，〈亡友月塘曾君墓誌銘〉，《衡廬續稿》，卷8，頁20a-25a。

曾于乾，字思健，號月塘，與胡直在少年時已成好友，既壯，又共同事歐陽德問學。曾于乾年少尚氣慨，有烈士獨行之風，但隨著年紀增長及向道之心日增，其行愈端凝平和。他是當地人爭相迎聘的教師，也是生員中的領袖，相當積極地參與地方事務，頗獲官員賞識。他曾上萬言書爭取開關糴鹽，又曾力抗知縣和庠師對學生的高壓態度，也曾受聘修縣志。他曾在大饑荒中出己貲賑濟本支與鄉里貧者，又因感於古道不復，常以正風俗、成人材自任，並申訂羅欽順(1465-1547)雲亭鄉約，在鄉推行達數十年之久。許多人慕名，不遠千里來拜其為師，故其及門弟子多達百餘人。²⁸⁰

當五人會成立時，歐陽德為他們寫了會籍之引，勉以知方立志，對於曾于乾有極高的期許。後來，曾于乾接受羅洪先的邀請為羅家子弟的教師，處松原長達六年，與羅洪先相問學，並曰：「予從是畢志斯學，即終身可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曾于乾約了諸同志到松原聚講，卻於九月七日中風病卒于松原，享年只有四十三歲。曾于乾雖一身為布衣，但其行卓異，乃得以列祀鄉賢祠。²⁸¹

王託，字有訓，是王直之兄王信的後代，弱冠契王陽明良知之旨，師羅洪先。又與胡直深交共學，相偕至松原向羅洪先問學。胡直言其好學：「取友四方，遠越數千里，近或百里，多至踰年，少或踰月浹旬。」²⁸²縣志則記其與羅欽順、歐陽德、胡直交相討論，得學正宗。²⁸³王託亦以布衣列祀鄉賢。

歐陽昌，字文朝，號蜀南，是歐陽德的族孫。少即有出色文才，年十三補弟子員，與胡直、王渤(1540 舉人)共學，治古詩賦，三人最為友善。方壯，偕曾于乾問學於歐陽德十年，後又偕胡直、王託共事羅洪先三年，其學浸入精微。歐陽昌的父親是歐陽乾元，官至刑部郎中，致仕之後，歐陽昌築愛日堂以奉居，號稱父子兩人以道交相成。²⁸⁴然而歐陽昌一生讀書，卻未

²⁸⁰ 胡直，〈亡友月塘曾君墓誌銘〉，《衡廬續稿》，卷8，頁20a-25a。

²⁸¹ 同上註。

²⁸² 胡直，〈王氏冠山墓記〉，《衡廬精舍藏稿》，卷12，頁13b-15a。

²⁸³ 《泰和縣志》(同治11年修、光緒4年刻本)，卷17，頁34a-b。

²⁸⁴ 胡直，〈愛日堂記〉，《衡廬精舍藏稿》，卷11，頁6a-8a。

能獲取功名，徒憂時愛國，頗有感慨，1567年忽染痢病，卒。²⁸⁵

除了五人會中的學者，歐陽紹慶(1517-1574)，亦即歐陽德的仲子，也是泰和縣第二代陽明學者中的佼佼者。歐陽紹慶稟承家學，早年除了經史教育外，也接受理學薰陶，更有許多交接各地陽明學者的機會。王陽明去世時，歐陽德製服設位，率子弟哭奠，當時歐陽紹慶十二歲。歐陽紹慶十六歲那年(1532)隨父親宦居南京，每當父親出郊寺講會，他總是隨從在旁，故得與安徽之貢安國(1556貢生)、沈寵(1537舉人)等學者相交。²⁸⁶他於嘉靖十六年(1537)回鄉參與考試，獲選補邑庠生。歐陽德回鄉家居時，經常出會江右同志，歐陽紹慶也多跟隨，遂「得聞所未聞」，也得以結交更多江右著名學者，如宋儀望、張春、周賢宣(1553進士)²⁸⁷、蕭廩(d. 1587)²⁸⁸、鄒善等人，並與本鄉的曾于乾、胡直定交共學。但隨著歐陽德再度出仕，歐陽紹慶也離開家鄉，隨父親講學。嘉靖三十一年(1552)歐陽紹慶通過鄉試，取得舉人資格，但會試屢次不第，後終在隆慶二年(1568)得中書舍人之職，此時則集同志數十人會講於靈濟宮、西瓦廠。歐陽紹慶後官至工部主事，隆慶六年(1572)左右回鄉丁憂，萬曆二年(1574)且偕胡直共赴青原與四方同志舉會，並相期偕隱共學，然天不假時，歐陽紹慶即亡於此年。²⁸⁹從其一生經歷看來，歐陽紹慶因為早年隨父親居宦地，中年又出仕在外，居鄉時日極短，因此他雖與胡直等泰和學者定交，但真正一起講學的機會卻很少，其對於陽明學在泰和一地的傳承，貢獻亦不大。

上述這幾位泰和第二代陽明學門人，雖然都因跟隨歐陽德講學而興發立

²⁸⁵ 胡直，〈亡友歐陽生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25，頁10a-13b。

²⁸⁶ 貢安國、沈寵也是著名陽明學者，他們的生平及與涇縣水西會的關係，見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卷12期1，頁53-112。

²⁸⁷ 周賢宣，字仲含，萬安人，歷延平守，時引博士弟子誦說經義，為海道副使時，軍務倥傯，便講道芝山書院，致仕後，與郡諸君子結社白雲之巖，訓迪後進。見王時槐，〈右布政周公賢宣傳〉，於焦竑，《國朝獻徵錄》（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卷90，頁3908-3909。

²⁸⁸ 蕭廩傳，見《明史》，卷227，頁5959-5960。

²⁸⁹ 胡直，〈歐陽乾江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24，頁1a-13a。

志，又在 1549 年組成以泰和為核心的講學會，然而當時他們尚掙扎於科舉考試，且大多無法獲取功名，曾于乾和歐陽昌又亡於 1560s，使得陽明學於此地開拓傳承的工作無法展開，最後此重責也只能落在胡直的身上。

胡直於 1549 年居家結五人會講學之後，次年再赴會試，再下第，之後他接受李春芳(1510-1584)的聘請，至興化教導李氏子弟。胡直因此番機緣而得聞王艮之學，且以其嚴謹態度一矯興化人對於泰州末流自恣放達的觀念，並開始立會講學。嘉靖三十二年(1553)胡直再次下第後，他終於接受眾友之勸，就選學職，遂得句容教諭之職。次年(1554)歐陽德去世，從其拜在歐陽德門下開始，至此已歷十數年，胡直屢興屢仆的學道歷程，雖然迂曲，卻也逐漸凝結出自己的心得。〈困學記〉中大段陳述其對程朱先儒與陽明近儒之說的質疑與批評，要言之，乃疑先儒以多見聞之博文窮理為專、忽略理在吾心；也疑近儒未言良知之天則，故使人不復知有至當至善處，遂墮猖狂自恣。並悟出自己的博約之說，他自述道：「由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俱得其理，浸悟歐陽公仁體之旨。」²⁹⁰

經過這番自悟，胡直出赴南京會友，與何遷、譚綸(1520-1577)、唐順之(1508-1576)、趙貞吉(1507-1560)等著名學者講論。終於，胡直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成進士，之後更得盡友海內諸學者。²⁹¹胡直初成進士時，不願接受嚴嵩的延攬，不久即外放，先後出任胡廣僉事、四川參議，又以副使督學四川。隆慶元年(1567)他自四川歸鄉，三年後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於萬曆元年(1573)致仕。

胡直成名之後，對於家鄉講學與教化的工作有了更具體的貢獻，他自四川歸鄉後，鄉之縉紳學者，無論老少，立即請為學會，而且動輒數百人參與，一時蔚為風尚。他對於地方鄉約的推行，亦有重大貢獻。當時，門人胡舜舉(1522-1576)，即胡堯時之子，帶著自己兩個兒子來問學，胡舜舉有感於盜寇作亂嚴重，鄉民不得安寧，希望仿倣胡直在四川施行鄉約禦寇的方式來團結

²⁹⁰ 胡直，〈困學記〉，於《明儒學案》，卷 22，頁 519-526。

²⁹¹ 《明儒學案》，卷 22，頁 526。

鄉民，經過胡直的指導，胡舜舉偕二三友人倡議決行，除了組織數百鄉民禦寇外，又印行求仁鄉約一冊分給各家，終於使盜寇之亂漸息。²⁹²

因著參與講學的人數增加，眾人遂決議在覺山寺之右興建書院。但因胡直的再度出仕，此議稍懸。萬曆元年胡直致仕歸鄉後，友人康宗望暨諸耆宿復申前議，又得門人胡舜舉率先捐金號召，終於在萬曆五年(1577)築成求仁書社。²⁹³清人梁弓復所做的書院序曰：「求仁書社者，邑前明隆慶間高行、信實兩鄉士耆為胡廬山先生建也，先生博古嗜道，淵源伊洛，其學以仁為宗……既請告退，居兩鄉之間，社建而來學者益眾。先生乃於講學外，立為條約，歲之期會，無賢不肖胥納於教焉。」²⁹⁴可見這個講所與地方教化的密切關係。此書社後毀於明季兵燹，根據《泰和縣志》中所載梁弓復與周召所寫的序，可見入清後書社又在胡直的後代與鄉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建復會，並且仍與教化美俗為主要訴求，但此與陽明學並無直接關係。²⁹⁵

萬曆九年(1581)以後，胡直大部份時間都待在求仁書社，與鄉人康宗望（時年約六十）及另一位樂君（時年約七十）共學，胡直描述他們共學的情形：「與二君憑欄嘯歌，二三子和之，」並請畫工畫了三人於書社共學的圖，稱〈仁社三逸圖〉。²⁹⁶然而，從胡直的文集和《泰和縣志》的記載，都無法見到門人環集於書社講學的景象，此固然可能受到張居正毀書院、禁講學的影響所致，但恐怕更反映了陽明學無法在泰和縣內持續有力發展的情形。胡直逝於萬曆十三年(1585)，此際正是各地展開重修書院、恢復講學之際，此種現象在泰和縣也看不到記錄。整體而言，從現有文字資料，的確不易找到晚明泰和縣內陽明講會活動的例子。雖然胡直確有門人，²⁹⁷其中最著名者當

²⁹² 胡直，〈螺溪處士胡君偕配劉孺人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 26，頁 9b-14a。

²⁹³ 見胡直，〈仁社三逸圖讚〉，《衡廬續稿》，卷 5，頁 5b-7b；〈螺溪處士胡君偕配劉孺人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 26，頁 9b-14a。

²⁹⁴ 《泰和縣志》（同治 11 年修、光緒 4 年刻本），卷 8，頁 14b-15a。

²⁹⁵ 同上註，頁 14a-15b。

²⁹⁶ 見胡直，〈仁社三逸圖讚〉，《衡廬續稿》，卷 5，頁 5b-7b。

²⁹⁷ 郭子章所寫的行狀中，提及為胡直整理文稿的門人陳秉浩、歐陽宗翰。見郭子章，〈先師胡廬山先生行狀〉，《蟻衣生粵草》（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 年），卷 6，頁

屬吉水的鄒元標，以及泰和的郭子章(1542-1618)，不過郭子章一生遊宦在外，看不出他對泰和本地陽明講學的貢獻。²⁹⁸正如 John Dardess 所論，即使歐陽德吸納了不少門生，但他並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泰和學派，不僅胡直沒有承繼歐陽德的學術，胡直之後，也後繼乏人。²⁹⁹

當然，影響陽明學在泰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尚有著名理學家羅欽順，羅欽順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又里居二十餘年，對地方家族整合、鄉約推廣極有貢獻，也深獲鄉人敬重；在理學領域中，他對宋儒之學以及王陽明之學的反省與批判，頗具哲學深度，王陽明、歐陽德都以他為主要對話者，雖然羅欽順之反對陽明學並沒有完全阻礙陽明講學活動在泰和縣的展開，但其影響力不可低估。惟關於羅欽順的研究，Irene Bloom 對其思想已有深入研究，John Dardess 書中也詳述其與王陽明、歐陽德之互動，故不在此贅述。³⁰⁰

六、結語

從以上諸縣陽明講會的活動發展，我們可以大致得知陽明講學在吉安府、乃至於整個江右發展的情形。根據時序推移來綜看，吉安府第一個陽明講會成立於 1526 年，是由安福南鄉劉邦采等學者領導組成的小型地方講會，1530s-40s 年間由於鄒守益、聶豹、羅洪先先後回鄉，歐陽德亦有四年的時間居鄉，這些著名學者在本鄉極力的倡導興會，加上程文德出任知縣以及徐階擔任江西學政的雙重助益，陽明講會在吉安有了突破性的發展：1533 年首次召開青原大會，從此青原會成為江右陽明講學的象徵；1536 年復古書院落成，使安福縣的陽明學更具擴展、傳承的實力；1558 年興建復真書

18b。

²⁹⁸ 郭子章的生平，見《泰和縣志》（同治 11 年修、光緒 4 年刻本），卷 17，頁 35a-38b。

²⁹⁹ Joh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ch. 8.

³⁰⁰ Irene Bloom, "On the 'Abstraction' of Ming Thought: Some Concrete Evidenc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 Ch'in-shun,"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69-125; Joh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ch. 8.

院，則是安福劉氏學者惜陰會講學的見證。1540s年間羅洪先帶動了吉水的講學風氣，從1543年玄潭雪浪閣的興建、1546年關石蓮洞、到1557年石蓮洞擴大增建，雖然羅洪先本人日益傾向潛居靜修，但一直到1564年他去世為止，石蓮松原始終吸引著各地學者前來請益講論，實為一重要的學術中心。永豐縣的陽明講學以聶豹為領袖，他雖沒有建立自己的講學書院，卻帶領眾多弟子，並參與青原、玄潭的講學，1543年曾夢祺構龍岡書院講學，1559年劉沈等學者建立了太極書院，也都與陽明學有重要淵源。泰和縣則靠歐陽德於1542-46年的興發，帶出一批年輕學者，加入青原、松原石蓮講學的行列。

歐陽德逝於1554年，鄒守益、聶豹、羅洪先均凋謝於1560s早期，此時陽明講學的氣勢已明顯衰弱。然而不久，第二代的江右學者成功地接棒，再度興起青原山講會的盛況，這一波的復興主要靠鄒德涵、鄒德溥兄弟於1569-1571年間的提倡，以及王時槐、胡直、劉元卿、鄒元標、郭子章等人的參與和帶領，同時也帶動了新地方講會的成立，以及地方書院、講所的興建，如1567年起王時槐帶領廬陵縣的能仁會，是日後興建西原惜陰會館的基礎；1573年劉元卿等興建的復禮書院，是安福西鄉講學的重要里程碑；1577年泰和的求仁書院則是胡直帶領講學的成果。

然而1570s興發的講學活動，不久便遇上最強勁的對手——張居正主政時期對講學的壓抑行動。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治阻力，講學活動雖未被完全扼殺，卻受創頗深，尤其像復古書院這樣著名的大書院，所受衝激更深。而隨著張居正去世、鄒元標上疏請復受毀書院獲准，於1583-85年左右，各地紛紛展開重修書院的工程，1583年仁文書院落成，日後成為鄒元標講學的重鎮，也是吉水縣的講學中心；1585年安福復古書院也重新完工；1583-1587年間王時槐的講學中心——西原惜陰會館——興建完成；安福西鄉以劉元卿為依歸的講學，則分別於1592年和1603年再建議仁書院、中道會館。

綜言之，從正德末年開始，江右陽明講學共經歷了三波興盛的風潮，都是靠各縣學者彼此聯合、共同講學所帶出的結果。這三個時期分別為：1510s當王陽明親身講學江右時期，此時許多學者信服良知學，歸入王門，此也是

陽明學派正式形成的年代；第二個時期是 1530s-1540s 年間，主要靠鄒守益、羅洪先、聶豹、歐陽德等人的帶領，青原會與復古書院的講學從此成為江右陽明學的代表，此也是陽明講學到達鼎盛的時期；第三個時期是 1569 到 1570s 初期，當時江右王陽明及身弟子均過世之後，講學氣勢衰微，此波復興講學的運動則由第三、四代陽明弟子領導，主要為鄒德涵、鄒德溥、王時槐、陳嘉謨、劉元卿、胡直、郭汝霖，仍然聚講青原山。

進入十七世紀，陽明講學氣勢明顯不彰，一方面學術和社會輿論紛紛指責講學的弊病、思以矯正之，一方面陽明學在經過三代、四代的傳承之後，學者對王陽明的學術雖依然尊重，但對這位先師本人則不再有那種全然相信、願意奉獻己生以傳其道的個人情感，加上不同聲音的思想論辯普遍激盪、陽明學被嚴格地反省與修正，即使晚明東林、復社等結社講學的風尚仍與陽明講學有關，卻已有意識脫離陽明學的內容。從吉安府陽明講會的發展情形，我們看見參與講學的人數減縮，立即反映的現象是：能夠在困難的科舉中脫穎而出、且願意投身陽明講學的菁英學者，變得稀少。上述吉安各縣，進入晚明都面臨缺乏縉紳之士提倡興會的局面，因此在十七世紀初，除了吉水的鄒元標和廬陵西原惜陰會賀沚等人所帶領的講學外，陽明講會活動已明顯衰微。再經過 1625 年魏忠賢的殘毀，更是雪上加霜。儘管後來仍有修復書院的舉動，以及清初施閏章試圖帶動青原會的努力，但畢竟陽明學的時代已過去，新修的書院可以承載另一種學術活動的進行，施閏章主盟的青原會，與其看做是對陽明學的提倡，毋寧說是對消逝中的陽明學的眷戀，以及對前代志氣風發學者們的遙念。

從上文所論各縣講會活動的發展，我們發現與安福相比，泰和、永豐、吉水三縣的講學風尚較不能持久。泰和縣的歐陽德因長期仕宦在外，兒子歐陽紹慶同樣居鄉日少，因此雖然歐陽出身泰和望族，父子兩人又熱衷講學，但其講學並沒有在泰和縣內扎根。而胡直一輩的泰和學者儘管有心講學，卻或困於功名，或早逝，不能成大氣候；胡直功成名就之後雖回鄉主持求仁書社講學，也無法形成一活絡的講學中心。永豐和吉水也同樣在晚明呈現後繼乏人的情形。永豐的聶豹曾經有力地吸納當地本有的白沙學風，與鄒守益、

羅洪先等人的講學聯結，在永豐縣帶出陽明講學的風潮，不過其門人中只有郭汝霖能夠承接在本鄉倡導講學的工作，郭汝霖晚年結合劉沈等地方學者，創建太極書院和敦復會，可惜從現有資料中幾乎看不出此地方講會的活動與後續發展。吉水縣的情形則是，羅洪先後來轉向靜修、對講學不熱衷，加上許多吉水門生早逝，使得吉水縣的講學活動在羅洪先之後（1564 以後）出現斷裂的情形。後來的鄒元標，其學實得於胡直等人在青原山的會講，而鄒元標於萬曆年間興發的吉水講學，則又多賴時勢與其個人聲望所成，且已不惜放棄陽明學的標幟。若先不論鄒元標的講學，吉水、泰和、永豐三縣從 1530s 陸續興起的陽明講會風尚，其實在 1580s 已明顯不能繼續。

相形之下，從安福縣擴大到廬陵的講學則有較長的延續性，地方鄉里的小型講會與復古、青原大會並存的情形也較明顯。鄒守益的家族能夠長期取得學術與社會菁英的地位，並且至少五代傳承理學、投身講會，使得鄒氏家族主盟的復古書院、東山會得以長期經營，且持續帶領青原講會。而安福南鄉的劉文敏等學者，則成功地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學術領袖，如王時槐、陳嘉謨、劉元卿等，並且將地方惜陰會的運作模式與精神，配合著學說的內涵，擴展到安福西鄉和廬陵西原。位於廬陵的青原會，同時擔負著江右講學精神象徵與實際凝聚各縣菁英會講的雙重功能，也有助於安福、廬陵地區成為江右講學的中心。

從上述的比較看來，儘管造成各地講學發展不同的因素複雜多重，但似乎可以總歸於一個主因：即是否能夠培養出具學術領導實力的接棒者。至於如何才稱得上是具學術領導實力？江右的史料顯示科舉功名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取得功名之後，居鄉時日的長短也是關鍵因素。無論早期的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或稍晚的胡直、郭汝霖、王時槐、劉元卿、劉孔當、陳嘉謨、鄒元標之所以倡學有功，都脫離不了上述兩個條件。這裡有一個令人玩味的現象，即政治上的平步青雲未必絕對有利於地方性的講學，江右陽明講學的興起主要維繫在一些學術與個人聲望俱高、但政治際遇坎坷因而長期家居的學者身上。一個地區若不能成功地培養進士級的講學接棒人，該地的講會記錄就會中斷，例如永豐的太極書院和泰和的求仁書社，我們都看不

到後續的發展。然而，既然明代陽明講學主要以地方性講會為基礎，安福各鄉惜陰會又是這種鄉邑講會的典範，大區域的菁英聯講大會反而只是季節或年度的安排，³⁰¹以各鄉惜陰會的規模而言，真的必須依靠進士級的學者來維繫嗎？難道不會是史料編纂汰留所造成的印象？

對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明確答案，不過卻值得思索。我們知道江西從宋代以降就是學術人文薈萃的菁華區域，以科舉成績而言，長期居全國之冠，吉安府又是江右之冠。³⁰²在這樣學術傳統強盛而悠久的地區，學術主張多元、重要學者輩出，因此學者若不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通常無法獲得地方歷史的書寫。江右地區的方志對於布衣講學的記載並不多，這情況固然可能反映實情，但也極可能反映了在學術水平傑出的地區，布衣講學的活動更難被歷史記錄的情形。從明萬曆年間修刻的府志凡例看來，編者的確有意識地大幅刪減舊志入傳的人數，只選擇聲聞甚隆、行為古蹈者入傳。³⁰³如果我們比較寧國府《太平縣志》的記載，也可或多或少證實這種現象。太平縣的陽明講學受到宣城與涇縣水西會的影響，太平縣在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中只出了八名進士，其中有兩名陽明學者，全縣並沒有形成由進士級學者倡導講學的局面，不過方志中卻記錄了許多由布衣學者、家族所倡導的地方講會，因為這些學者和家族講會的確足以代表太平縣的學術與文化。³⁰⁴反觀江右的情形，目前我所見的材料，鄒守益、劉元卿、劉孔當的文集中記錄了一些地方小講會和家會的名稱，方志史料則看不到太多布衣講學的例子。這樣的史

³⁰¹ 地方性小規模講會的形成有利於經常性的聚集，規模與組成形式與各地文社並無太大差距，但學術理念不同，陽明學之興盛與此地方講會的普及有密切關係。見呂妙芬，〈陽明學講會〉，《新史學》，9.2（1998年），頁45-86。

³⁰² 吉安府從宋仁宗天聖(1023-1031)以後直到明洪武、永樂止，在科舉中一直居領先地位，直到十五世紀才被浙江與江蘇超前，但其在有明一代的總進士人數仍維持全國第三。見王時槐，〈文昌塔記〉，《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3，頁27b-30b；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27;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pp. 256-260.

³⁰³ 見《吉安府志》（明萬曆13年刻本）凡例。

³⁰⁴ 參見呂妙芬，〈明代寧國府的陽明講會活動〉，《新史學》，卷12期1，頁53-112。

料問題，的確讓我們不禁會「想像」，即使沒有著名的學術領袖，一些小書院和講所內仍可能持續著小型的講會，在這個意義下，上文所論吉水、永豐等縣講學活動中斷則可能是個輕率的妄斷，我們或可期待將來從更多史料中挖掘江右地區在晚明持續有講會活動的史實。不過若就地區學術的代表與影響而言，上文所勾勒的講會興衰史也算不上大錯誤。

若我們先聚焦在學術政治的菁英領袖身上，來看看吉安府九縣在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進士人數：安福 72 人、廬陵 57 人、泰和 53 人、吉水 37 人、萬安 20 人、永豐 17 人、永新 13 人、龍泉 1 人、永寧 1 人。（見附表一）這些數字說明了吉安南北各縣學術實力的重大差距，以及為何吉安南方各縣無法與安福、廬陵、泰和、吉水所形成的學術文化菁華區抗衡。事實上，明代全國超過 1,200 個州縣中，只有 10 個縣產生超過 200 名進士，而安福縣是其中之一；又只有 37 個縣產生 100 名以上進士，安福、泰和、吉水、廬陵均廁其中。³⁰⁵陽明學就是在這些具學術領導實力的縣內取得一席之地，它的可見度和影響力才會如此強盛。不過，陽明學即使在它最興盛的時期，仍然無法壟斷江右的學術界，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些進士中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沈浸在陽明講學活動中，但若根據方志和文集標明的記錄來估算，安福縣 72 名進士中，約只有 10 人屬於陽明講學者，比率並不高。其他縣更只有在 1/10 左右的低比率。這樣低的比率，加上不是每位進士都有機會歸鄉或有足夠的熱忱投身講學工作，以及陽明學在三、四代傳人身上對學派意識的逐漸渙散等因素，也大致可以瞭解何以陽明學難以持續在各縣內保有學術領導地位。

另外，從長期學術史的眼光，我們也看到宋儒和陳獻章之學的影響力。除了上文所論永豐縣羅倫的講學與白沙學的關係、羅洪先的宋學師承等實際學術環境的考量外，在思想內涵上，聶豹和羅洪洗的學說也有相當周敦頤、李延平的影子。其實更廣泛地說，王陽明的學術本來就是從朱子學轉手而出，其主要對話者便是朱熹，陽明學能夠在江右快速崛起，當地學者對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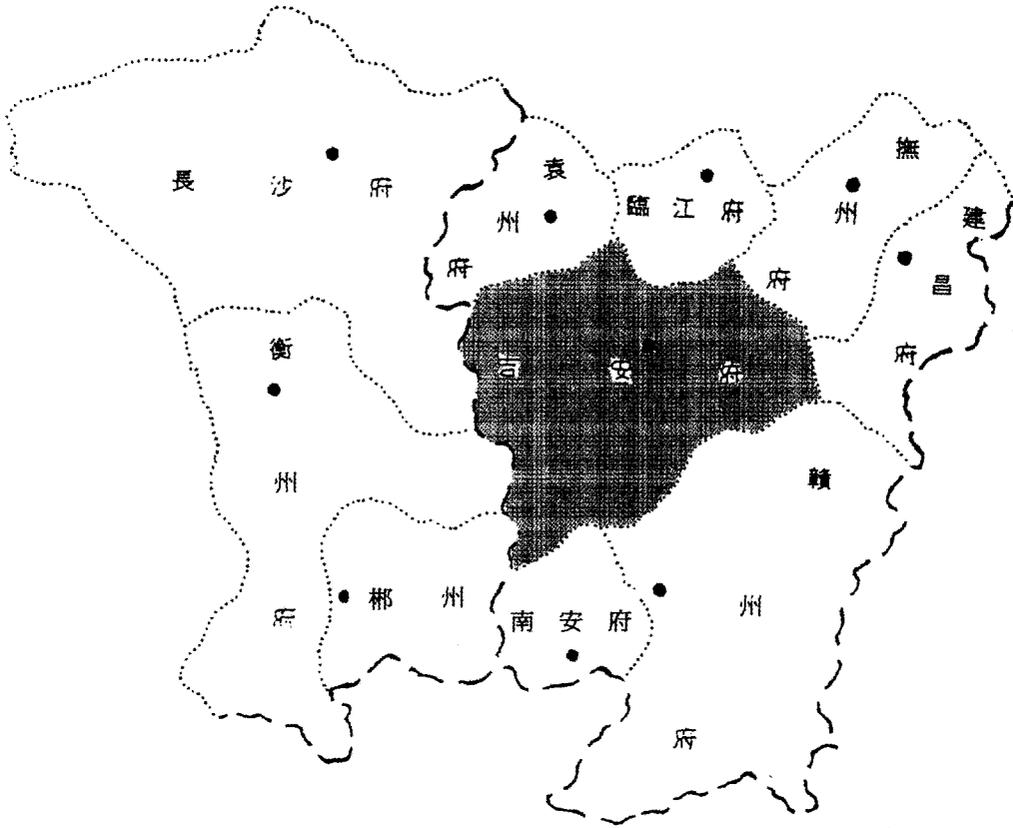
³⁰⁵ 吳宣德，〈明代進士的地理分佈〉。

以來理學論述之熟稔與關懷，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我們從劉文敏、劉邦采之所以傾心於陽明學，即可見一斑。我們也不能忘記，陽明學從來沒有真正壟斷過江右學界，它始終必須被置放在宋明以來的儒學發展中被檢驗與比較。從泰和學者羅欽順對陽明學的排拒以及對程朱之學的反省，³⁰⁶我們也可以看見江右豐厚的學術實力。這個學術場域一方面提供陽明學得以因勢崛起的資源，使它成爲舉國聞名、深具影響力的學派；另一方面，也能夠及時對陽明學的發展提出反省與批判，甚至不惜改弦易轍。

至於晚明江右學者身處於一地域交通方便、學術資訊交流普及的時代，面對著來自江左地區的經濟優勢，以及不同文化和學術主張的衝激，這些屬於晚明特殊的文化處境如何激化江右學者對陽明學發展以及講學活動的反省、如何塑造晚明江右講學的特殊風格、甚至再次強調且建構屬於江右的悠久學術傳統等議題，實值得更仔細而深入的探討，惟本文無法涵括，盼未來能撰另文討論。

³⁰⁶ 見 Irene Bloom, "On the 'Abstraction' of Ming Thought: Some Concrete Evidenc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 Ch'in-shun."

附 錄



圖一 吉安府相鄰府州圖，此圖是陳正祥編，《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圖冊》（東京：原書房，1983年）中明末府州地圖局部。

表一 明代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吉安府各縣進士人數

考試年代	縣(府)									
	永豐縣	安福縣	吉水縣	廬陵縣	泰和縣	萬安縣	龍泉縣	永新縣	永寧縣	(吉安府)
嘉靖 癸未(1523)	0	7	4	2	1	0	0	0	0	14
丙戌(1526)	0	2	0	0	6	0	0	1	0	9
己丑(1529)	0	3	6	1	3	0	0	0	0	13
壬辰(1532)	2	0	2	2	0	2	0	0	0	8
乙未(1535)	2	1	0	0	2	0	0	2	0	7
戊戌(1538)	0	1	2	1	3	1	0	1	0	9
辛丑(1541)	2	0	0	0	3	2	0	1	0	8
甲辰(1544)	2	2	0	2	2	0	0	0	0	8
丁未(1547)	1	2	0	2	1	0	0	1	0	7
庚戌(1550)	2	0	1	1	0	0	1	0	0	5
癸丑(1553)	2	0	1	4	2	2	0	0	0	11
丙辰(1556)	0	3	2	0	1	2	0	1	0	9
己未(1559)	0	2	2	1	2	3	0	0	0	10
壬戌(1562)	0	1	1	0	1	0	0	2	0	5
乙丑(1565)	0	1	2	2	0	1	0	0	0	6
隆慶 戊辰(1568)	1	3	2	2	0	1	0	0	0	9
辛未(1571)	0	8	0	3	4	0	0	0	0	15
萬曆 甲戌(1574)	0	0	2	2	2	0	0	1	0	7
丁丑(1577)	0	2	2	1	1	1	0	1	0	8
庚辰(1580)	0	3	0	3	1	1	0	0	0	8
癸未(1583)	0	4	1	3	2	0	0	0	0	10
丙戌(1586)	0	4	2	0	3	0	0	0	0	9
己丑(1589)	1	4	0	0	0	1	0	1	0	7
壬辰(1592)	0	3	0	2	0	0	0	0	0	5
乙未(1595)	0	1	0	2	2	0	0	1	0	6
戊戌(1598)	0	1	0	1	0	0	0	0	0	2
辛丑(1601)	0	3	1	6	1	0	0	0	1	12

縣(府) 考試年代	永豐縣	安福縣	吉水縣	廬陵縣	泰和縣	萬安縣	龍泉縣	永新縣	永寧縣	(吉安府)
甲辰(1604)	1	0	1	2	1	0	0	0	0	5
丁未(1607)	0	2	0	2	1	0	0	0	0	5
庚戌(1610)	1	3	1	0	1	1	0	0	0	7
癸丑(1613)	0	0	1	4	2	1	0	0	0	8
丙辰(1616)	0	2	0	4	2	1	0	0	0	9
己未(1619)	0	4	1	2	3	0	0	0	0	10
三朝吉安府各縣 進士總人數	17	72	37	57	53	20	1	13	1	271

*此表根據各縣方志資料製作。